

殖民知識的生產與再建構 ——「滿洲國」時期的古物調查工作*

林志宏**

摘要

滿洲國的各種文化活動如何協助日本殖民工作，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繼續保留下來？本文以古物調查工作為例，探討滿洲國在日本帝國殖民史上的角色，並勾勒帝國主義與知識之間的關係。由於1930年代東亞民族與國家主權意識的高漲，滿洲國訂立有關保存古物的法律，並與日本進行「合作」之學術調查。雖然調查工作本身有其軍事和政治之目的，可是它們卻符合滿洲國與日本雙方各自需求。「日滿文化協會」不但是進行這方面調查的半官方組織，也是解決古物所有權的辦法之一。通過調查古物，日本探詢各項經濟、自然資源，又藉此肅清各地抗日勢力，同時反思自身學術發展；滿洲國則確立自己繼承清朝的淵源，尋求立國的合法性基礎。一方面，古物調查從歷史裡打造「東亞共榮」傳統外，另一方面則吸引了中國「協力者」的參與。歷經數次不同政權的統治，這些「協力者」以地方意識為訴求，繼續發展有關「滿洲」的學術與知識。

關鍵詞：滿洲國、古物調查、殖民帝國主義、知識生產、日滿文化協會

* 本文係科技部研究計畫「日滿文化協會的中國學術調查工作（1933-1945）」（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01-084-MY2）部份研究成果。初稿曾蒙吳啓訥教授、大出尚子博士兩位評論人提出寶貴建議，復蒙二位匿名審查人細心審閱，得以避免許多謬誤，在此敬致謝忱。
收稿日期：2014年2月21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9月5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前 言

人類知識的進展經常來自於現實環境所需。在十六世紀海權擴張的時代，西歐國家爲了瞭解其他異文化和民族，殖民事業中更是緊密結合了學科知識，進行生產與重組的過程。參與其中的人們，有些懷抱對未知的渴望，有些則是經由理解世界來建立自我認同與優越感。殖民活動不僅提供知識發展的空間，還藉由它們對其他地區進行控制，成爲「文明」的傳播者。然而，知識在文化交流中不獨扮演協治理理的功能，同時也深化了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的實作及進展。當殖民事業終結後，知識生產並不因此而阻斷消失，反倒成爲地方僅存的遺產，通過再建構的方式繼續傳承下去，成爲另一種思想資源。

這一篇文章裡，筆者藉由「滿洲國」（以下行文省略引號）的古物調查工作，思考上述問題。如所週知，1932年3月1日成立的滿洲國，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始終飽受爭議，引起眾多關注。自從1905年日俄戰爭勝利之後，日本帝國便積極朝向「滿洲」（含東三省與內蒙古東部，以下行文省略引號）擴張勢力，發展此一「新天地」；許多人於夢想及口號下紛紛投身參與，轉化爲實踐理念的力量。¹可是，不同於殖民地臺灣和朝鮮，滿洲國卻爲日本「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的一環。²因此在「傀儡」和「主權國家」之間，

¹ 有關滿洲國成立前日本留意中國東北局勢，包括對軍事（關東軍）、經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投入，以及各個不同階段之變化，乃至對國內的影響，見 Yoshihisa Tak Matsusak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² 「非正式帝國」意指帝國主義於殖民統治及軍事干預之外，透過商業資本積累、戰略和軍事利益的延伸，對非殖民區域或國家發揮一定程度影響力。二十世紀中國以「次殖民地」角色被西方列強支配貿易、生產及市場，也是非正式帝國典型的例子。見 Jürgen Osterhammel, "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oward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Wolfgang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p. 290-314。至於討論日本對中國及東亞地區的擴張，可見 Peter Duus, "Japan's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An Overview," in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這個新政權究該扮演何種角色？而對待日本軍事占領與殖民關係上，又是怎麼進行有效統治，並確立合法性呢？

實際上，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由於背負出賣國家和民族的惡名，滿洲國的歷史定位可謂相當渾沌不清，甚至被認為身兼傀儡丑國與夢想樂土的「嵌合體」（chimera）形象。³特別是中、日兩國所造成的民族情感與仇恨，促使多數研究者站在各自特定的立場發聲，以既有的主觀態度分析歷史資料，進行於己有利的詮釋。像是一本以「真相」為主題、由「中日學者共同研究」的滿洲國史著作，編者分別係為「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和「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會」之成員，光從編輯名稱即可窺知各自觀察的面向與立場，⁴其他不言而喻。因此，雙方學者多半不願誠實地面對與思考「戰爭責任」，⁵故選擇議題探討時往往各說各話，無從聚焦。就像兩條沒有交集的平行線般，單向的歷史解釋既缺乏反省，也使得那些長期處於灰色地帶、曖昧不明的史實，因價值判斷而捨棄了正面思考。滿洲調查工作帶給今日的印象便是如此。

至於歐美方面有關日本對滿洲的調查研究，大抵環繞在殖民權力和知識間之關係，較無意識形態的束縛。譬如，從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角度思考滿洲國本質的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日本有關鄂倫春地區民族學調查，嘗試刻劃一種「原始本真」（primitive authenticity）的滿洲生活樣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xi-xxix；ピーター・ドウス著，藤原歸一譯，〈植民地なき帝国主義——『大東亜共栄圏』の構想——〉，《思想》，號 814（1992 年 4 月），頁 105-121。

³ 「嵌合體」是山室信一提出的說法。他指出，滿洲國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呈現是虛實間擺盪不定之政策，一方面做為有別於西方國家而建設的理想樂土，另一方面則又掩蓋了帝國侵略的現實。其中有關實相與幻象相互交織的討論，見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6，增補 3 版），頁 278-310。

⁴ 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會編，《偽滿洲國的真相——中日學者共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⁵ 「戰爭責任」問題迄今相關討論亟多，不可勝數；所涉及的項目包括戰爭賠償、戰後軍士兵生活的安排、相關檔案毀損、軍事審判、歷史教育等。茲舉有關歷史研究角度的檢討，見吉田裕，《現代歴史学と戦争責任》（東京：青木書店，1997）；Miki Y. Ishikida, *Toward Peace: War Responsibility, Postwar Compensation, and Peace Movements and Education in Japan* (New York: iUniverse, 2005)。

貌。他指出在新的滿洲政權和外來殖民之下，此一代表「原始本真」的文化猶如呈現出自身價值，應受到統治者的維護和保存。⁶另外，杜博思（Thomas David DuBois）則以民族誌編纂為題，探討地方宗教如何納為日本帝國的治理政策。根據其分析，通過行諸於學術論述、期刊和社會實踐之中，日本在滿洲的田野調查是將地方習俗化為知識文字，並提供給行政機構做為施政的資訊與殖民基礎。惟不同於歐美的殖民經驗，日本民族學係經由地方宗教來凸顯傳統，甚至置入更大的話語如「亞洲主義」（Pan-Asianism）之中，以符合殖民政策之需。⁷

在理解殖民調查工作的意義上，分析滿洲國時期的古物調查，同樣對重新掌握帝國及知識的關聯具有深刻意義。筆者認為滿洲國的歷史經驗裡，生產殖民知識不僅來自統治者一方操縱而已，它也是因應時勢的需要而出現。以古物調查來看，這項工作絕非滿洲國的特例，在人類殖民史上固然有跡可循；不過，衡量時應該考慮到其中軍事戰略的意義，特別是關於思想宣傳的部份。再者，知識生產非可僅從「殖民」或「侵略」的角度輕率略過，應該還要考慮到人際網絡、知識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機制等複雜關聯。因此，本文不但希望瞭解知識生產的過程，更有意釐清當中歷史的幽暗面。

為了能夠清楚說明，本文的書寫策略將著重在三層面。首先，關於古物調查事業的歷程，筆者將從：一、制定法令；二、調查活動之進展；三、相關組織的成立等來談。組織方面個案則以 1933 年所成立的「日滿文化協會」（或稱「滿日文化協會」，係由側重方所命名，本文概從「日滿文化協會」）進行討論。其次，要集中在探究調查工作之意義，分析日本帝國的想像與長期對「滿蒙」研究的關懷。最後，本文打算以兩位「協力」參與者——金毓黻（1887-1962）和李文信（1903-1982）為例，進而分析他們的心態及其轉折。

⁶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 Moder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 187-188.

⁷ Thomas David DuBois, "Local Religion and the Imperial Imaginary: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Ethnography in Occupied Manchuri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1 (February 2006), pp. 53-57.

一、「以法為名」的調查事業

（一）東亞地區重視古物風潮

二十世紀最初 30 年，東亞掀起一波波重視古物的浪潮。揆其主因，乃受民族主義高漲之影響，擁有歷史文物的國家莫不訂立相關法規條文，藉此強調主權及國家象徵。先以中國為例，民初雖已制定保護古物相關辦法，可是迄至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才邁入到真正推展文物保存與管理事業的階段。1930 年 6 月，國府正式公布《古物保存法》，確立其中範圍及種類，並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隸之。⁸誠如近人指稱，此一「首次以法律形式體現國家文化主權」的條款，⁹不僅吸引了歷史學、考古學、博物館學等許多專家和機構參與工作，也體現中國成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重要的篇章。

至於日本則更早留心古物維護，約自 1890 年代中葉便已開始推動相關工作。1899 年帝國議會為了保存古墳古蹟，著手制定〈古墳舊蹟保存法案〉，修飭與歷代天皇相關的遺址；1911 年隨著鄉土意識高漲，又有「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協會」之設立，並發行機關刊物。¹⁰推動這方面工作最具代表的人物，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黑板勝美（1874-1946）。他呼籲要由國家來出力負責；當時思考點係從歷史的角度出發，以「史蹟」規範傳統文物。然而同為東京帝大教授的植物學學者三好學（1862-1939），看法則與此稍異；他認為應該區分所謂「文化紀念物」（Kulturdenkmal）與「自然紀念物」（Naturdenkmal），意即並非屬於人為史蹟的後者，也應得到重視。後來官方採行三好學的主張，於 1919 年 4 月公布《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成

⁸ 「本院法制委員會報告起草古物保存法案經本院第 92 次會議議決錄案並繕具條文呈請鑒核施行由（民國 24 年 6 月 17 日）」，〈古物保存法及施行細則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1-012111-0004。

⁹ 史勇，《中國近代文物事業簡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頁 106。

¹⁰ 森本和男，《文化財の社会史——近現代史と伝統文化の變遷》（東京：彩流社，2010），頁 383-384、395-400。

爲日本政府保存古物法律的濫觴。¹¹

直到 1930 年代起，日本對古物之界定與保存方式，也擴及於海外殖民地地區。儘管其中還有其他的因素存在，¹²可是卻也呼應了「帝國」發展的需求。與中國東北緊鄰的朝鮮半島，原先在 1915-1926 年間，由朝鮮總督府委派日本學者對高句麗、新羅、百濟等古國遺址進行調查；1930 年則針對朝鮮式木造建物日益廢棄的現象，特別撥款 11,000 餘圓補助地方經費加以搶修。¹³隨著日本帝國對殖民地古物的法制化要求下，關於保護「自然紀念物」的法規也開始陸續訂立。像是 1933 年 8 月，爲了應付旅客日益激增所造成古蹟、文物的毀損，遂頒布〈朝鮮寶物古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令〉，且將地上建築與地下埋藏物劃定納入保護範圍。¹⁴同樣地，隨著日本勢力擴及滿洲，新政權成立後也「以法爲名」，配合進一步發展中國研究的同時，《古蹟保存法》應運而生。

（二）滿洲國訂立《古蹟保存法》

在滿洲政權建立以前，東北的古物調查與保存活動並非毫無進展。大體而言，除了日人所進行的考古挖掘外，¹⁵中國方面也不遑多讓，像金梁（1878-1962）於盛京（今瀋陽）故宮活動的情形即是例證。金氏爲近代中國著名的滿族文士，論者嘗謂其「對東北文化貢獻至深」；¹⁶他最初在 1908 年

¹¹ 文化財保存全国協議会編，《新版遺跡保存の事典》（東京：平凡社，2006），頁 18。

¹² 像以經濟效益來說，伴隨 1920 年代日人海外旅行的風氣盛行，整飭古蹟、文物也成爲吸引觀光客的條件之一。白幡洋三郎，《旅行ノススメ：昭和が生んだ庶民の「新文化」》（東京：中央公論社，1996），頁 86-92。

¹³ 藤田亮策，〈朝鮮に於ける古蹟の調査及び保存の沿革〉，《朝鮮》，號 199（1931 年 12 月），頁 106。

¹⁴ 渡邊豐日子，〈朝鮮の寶物古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に就て〉，《朝鮮》，號 234（1934 年 11 月），頁 1-7。相關討論亦見太田秀春，《近代の古蹟空間と日朝關係：倭城・顯彰・地域社会》（大阪：清文堂，2008），頁 65；荒井信一，《コロニアリズムと文化財——近代日本と朝鮮から考える》（東京：岩波書店，2012），頁 91。

¹⁵ 近人曾以大連一地爲例，羅列當中日本官方、學會、專家之熱衷情況。參見許明綱，〈日本人の大連における考古活動（1895-1945 年）〉，《古代文化》，卷 45 號 10（1993 年 10 月），頁 47-53。

¹⁶ 橋川時雄，《滿洲文學興廢攷》（北平：文字同盟社，1932），頁 63。

出任奉天旗務處總辦，負責解決旗人生計問題。1910年東三省總督錫良（1853-1917）奏請朝廷於盛京故宮內修建博物館，金梁曾參與草擬建議書，結果遭到否決；儘管議論雖罷，但金氏「仍擬清理藏珍，詳編目錄」，後來則錄成《盛京故宮書畫錄》。¹⁷民國建立後，以遺民自居的金梁繼續著手漢譯滿文老檔，編有《滿洲老檔秘錄》。直到1926年11月，奉天省政府決定以瀋陽故宮為基址，創設東三省博物館；兩年後又聘任金梁為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且於1929年4月時正式對外開放。金氏遂以此為起始，清點了故宮遺物，同時制定有關圖書的蒐集、保存、閱覽等辦法，並編印《博物館陳列古物冊》，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為止。¹⁸只是這些工作的推展，毋寧顯現了私人之努力，而非公領域有系統性的古物調查事業。

1932年3月滿洲國甫立之際，調查古物旋為官方關切目標，惟統治基礎尚未穩固，斬獲甚微。以奉天省為例，剛開始時要求地方各縣呈報，但成效未彰，民眾普遍並不重視。¹⁹於是1933年7月1日，國務院文教部特別公告《古蹟保存法》做為法源依據。《盛京時報》公布消息時，特別提到當中立法緣由，強調東北史地的特殊性。報上說：滿洲地處古代遼、金王朝乃至清代勢力範圍，隨處可見貴重的文化遺蹟，如今卻面臨各項建設事業進展與現代文化入侵，不免可能發生自然破損及人為毀壞之虞，為求解決此一問題，決定立法保護。²⁰細察《古蹟保存法》推行之目的，除有動用官方力量限制任何私人的挖掘活動外，還明文界定何謂「古蹟」，分為四類，見下表之整理：

¹⁷ 金梁，《光宣小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35。

¹⁸ 東三省博物館期間金梁的作為，見佟悅，〈金梁與初期的瀋陽故宮博物館〉，《中國博物館》，1989年第4期，頁15-20。

¹⁹ 〈催令各縣署呈報古物〉，《盛京時報（晨報）》，1933年1月31日，第4版。

²⁰ 〈本邦古蹟甚多，文部制定保存法〉，《盛京時報》，1933年5月19日，第4版。該法規的內容共有十七條，詳《古蹟保存法》，收入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9），冊86，頁19-20。

滿洲國《古蹟保存法》的分類

分類	界定物
古蹟	貝塚、陵墓、壁壘〔畫〕、長柵、城廓、關塞、烽火台、壇廟、寺廟、古陶窯、園囿、古井泉、樓塔等與史實相關的遺蹟，以及一切古建築。
古物	歷史時代的遺物、碑碣、金石、陶器、文玩、武裝、服飾、雕刻、禮樂器、書畫類等，還有宗教、美術、考古及歷史的參考資料。
名勝	山林、湖沼等風景處有益於國民修養場所。
天然紀念物	老樹、神木、靈巖等勝地，還有動植物學、地質學、礦物學、氣象學等珍奇天然物。

資料來源：里見甫編，《滿洲國現勢（建國——大同二年度版）》（新京：滿洲國通信社，1933），頁74。

其中「天然紀念物」一項，涉及範圍廣泛，顯見參照前述日本對文化資產的理解與劃分方式。此外，滿洲國中央通令要求各地方政府的教育廳進行調查，具報境內現有古蹟、文物之情況。調查要項包括六項：（1）種類名；（2）所在地；（3）從前如有傳說，可記其概要；（4）管理者或所有者之有無，如有可記其姓名及住所；（5）關於現在狀況之概要；（6）如可能時，可添附圖樣、相片、印本或文獻，裨供參考。²¹調查原則非僅確立工作先後順序，更經文教部許可下製作「證明券」，藉以明示調查員身分，資昭證信。此一作法同樣也無形中擴張了行政權，譬如規定行使職權「於必要時，該調查員得入他人土地內土地內，為發掘土地、撤去障礙物、建築標石標柱等行為」。²²

²¹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教育史研究會監修，《滿洲帝國文教部第二次年鑑》（新京：編者印行，1936），頁 584。又見〈古蹟保存法施行規則〉，收入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冊 86，頁 24。

²² 《古蹟保存法》，收入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冊 86，頁 19；另見〈文教部注意調查

官方推行《古蹟保存法》，究竟產生多少實質效能，不易評估。若從《文教月報》載錄的公文得悉，確實有縣級政府向上呈報古器舊物遭到毀損、亟待補助修繕費用之情事。²³1938年，民生部進而又制定縣市旗的史蹟名勝保存會準則，要求「官民一致協力，以期事業之達成」，據此得悉成果仍然有限；直到1941年8月，滿洲國境內幾乎遍布古蹟名勝保存會，共設多達170處。²⁴而地方基層配合中央政令，到處蒐羅古物之情形，不勝枚舉。如鞍山中學設有「歷史地理陳列室」，校長堀越喜博尤其鍾愛石拓印本，個人便藏有多幅；不僅如是，「此校搜集古物之法，多向學生家屬募集，所得成績極佳。據其蒐集品目錄所列，有一千五百種之多，可謂富矣」。²⁵這段引自金毓黻日記的文字，亦可想見《古蹟保存法》帶來的效應。

推行維護古物法令，既有「對照」過去的功能，並且彰顯滿洲國如何重視教化。就在政令推出前後，《盛京時報》有兩則新聞，充斥類似「宣傳」的意味。第一則內容是訴諸舊政權時期素來對文化資產的漠視，說古蹟古物「受張家二代〔按：指張作霖（1875-1928）、張學良（1901-2001）父子〕之虐故，均皆永久埋藏於地下，迄未得以發現」，如今的局勢業已改觀。²⁶另一則報導乃關於1933年3月奉天城東靖安軍營舍所在地發現達海（1595-1632）的墓碑三通。²⁷達海原係滿洲正藍旗人，據傳精通滿、漢文；天聰年間他曾將蒙古

古蹟，製古蹟調查員證明券，飭各地軍民協助愛護》，《盛京時報》，1933年12月27日，第4版。

²³ 如遼寧開原縣內「石塔寺古塔傾圮不堪，擬招工修補」，文教部則回函：「查該縣古塔係縣內悠久古蹟，自應從速修補，以重文化」，遂撥發3,000元，惟「其餘不敷之數，由該縣自籌，俾竟全工」。另外像間島省公署轉報「安圖縣勘查白玉蛟龍碑情形」。俱見〈指令·文教部指令第151號〉，《文教月報》，號1（1935年8月），頁42；〈指令·文教部指令第206號〉，《文教月報》，號2（1935年9月），頁10。

²⁴ 民生部厚生司教化科編，《滿洲古迹古物名勝天然紀念物彙編》（新京：編者印行，1941），頁7-17。

²⁵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以下略為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瀋陽：遼瀋書社，1993），冊5，總頁3470-3471，1934年11月9日條。

²⁶ 〈國內古蹟古物出現有待，文教部已令各省調查〉，《盛京時報》，1933年6月10日，第2版。

²⁷ 該墓碑群由奉天醫科大學的山下泰藏、佐藤文比古兩人確認，分別為：康熙四年誥封達海碑、康熙九年敕建達海碑及與達海密切關連的鈕祜祿氏碑。見鴛淵一，《滿洲碑記考》（東京：目黑書店，1943），頁44；倫俊巖，〈達海墓考證〉，《北方文物》，2006年第4期，頁52-54。

語改編成滿語母音，為滿語的創成者及碩學之士，一生年僅 38 歲。此一考古消息傳開後，引來廣島大學的教授鴛淵一〔內藤湖南（1866-1934）之婿〕前往探視，並於報上發表談話：「該氏墳塋自數百年後之今日，且在滿洲國成立後被發現，吾等學徒，不勝欣快」，強調古墳挖掘與滿洲國之成立，相互輝映。²⁸質言之，《古蹟保存法》的訂立及實施，無疑適時說明新政權的「文治」事業，提供最佳註腳。

從法律層面來說，滿洲國的《古蹟保存法》雖確立了境內古物的權限，可是若以「文化侵略」之立場論析，此法猶如「日本人為其在東北進行考古調查挖掘制定的法規」。²⁹日人自中日甲午戰後，制定「大陸政策」，逐漸強化對朝鮮、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尤其簽訂《樸資茅斯條約》與《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擁有遼東半島上的各項利權，³⁰前仆後繼地考古工作正是其中一環。等到滿洲建國，到處調查、挖掘的活動更不絕如縷，法條的訂立無疑開啓方便大門。

二、先占領，後調查

（一）建立「學術探險」的模式

早自 1930 年代之前，日本便「以學者為前驅」，³¹蒐集各種有利於侵略的訊息，使得學術研究本身充滿政治性。回顧日本帝國發展史，人類學學者配合國策進行殖民地和其他地區調查，並非孤例。³²以中國東北為例，關東軍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行文簡稱「滿鐵」）沿著鐵道附屬地發展，

²⁸ 〈滿語鼻祖達海墓已發現，地址判明在城東五里地點，各考古家來奉共同研究中〉，《盛京時報》，1933 年 8 月 10 日，第 4 版。

²⁹ 李娜，〈滿鐵對文化名城及古建築的「踏查」〉，《東北史地》，2010 年第 1 期，頁 89。

³⁰ 包括承認日本在旅順、大連的租借權，以及鐵路經營權、鐵路附屬地行政權、滿鐵材料免稅的利益、鴨綠江沿岸木材合辦權、與朝鮮國境貿易的最惠國待遇、大連港關稅的免除權，乃至「滿洲」成為中立地等。陳經，《日本勢力下二十年來的滿蒙》（上海：華通書局，1931），頁 14。

³¹ 這是陳彬龢對日本侵華策略的形容。語自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3，總頁 2573，1931 年 3 月 8 日條。

³² 這方面已有具體的研究成果，如坂野徹，《帝國日本と人類学者：一八八四——一九五二年》（東京：勁草書房，2005）。

委派人類學學者進行調查，主要目的有三：一是爲了瞭解地方的宗教信仰，掌握民情；二是留心共產勢力在基層社會中的發展；三是得以蒐羅蘇俄、蒙古方面情資。³³直到 1932 年 3 月滿洲國成立後，伴隨控制力日益擴張，學術調查及研究更配合統治之需，軍事力量的介入愈形密切。³⁴後來中日外交情勢格外嚴峻之際，原由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所負責的考古及民俗學調查工作，更改由軍部主導，³⁵亦顯示其中情形。調查工作遂配合「肅清治安」的目標，相輔相成。

熱河調查即是上述學術與政治交織的代表。滿洲國新建初期，熱河情勢一直爲備受關注的重點。本來清末民初之際，中國對內蒙古東部採取開禁政策，前往屯墾的漢人愈來愈多，造成漢、蒙兩族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衝突不斷。1931 年發生「九·一八」後，中國東北情勢丕變，關東軍於是積極地拉攏當地蒙古青年，協助內蒙獨立，有意脫離中國而「自治」。隨即日方強化所謂「特殊統治」的觀點，在滿洲國興安省內更設立行政組織——「蒙古自治領」，對漢、蒙族之間矛盾展開分化。³⁶這一連串的舉動，最終有 1933 年 2 月末由關東軍與滿洲國軍隊合作、共同發動的熱河戰役。3 月 4 日，日滿兩軍占領承德，原南京國民政府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1871-1937）所部潰敗；5

³³ Katsumi Nakao, "Japanese Colonial Policy and Anthropology in Manchuria," in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s.,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 (Surrey: Curzon Press, 1999), p. 250.

³⁴ 位於中俄邊境鄂倫春即爲實例。1930 年代初期，當地居民本來公開反對滿洲國，直到最後則與日軍合作。主要成功因素之一，跟日本人類學者居間參加調查，瞭解鄂倫春生活情形〔例如泉靖一（1915-1970）提到當地青年不婚，乃受近親禁忌及花嫁婦女費用過高的緣故，後來撰成研究紀錄〕有關。此外，爲了進一步控制鄂倫春，日軍曾蒐集該地使用鴉片的情形與資訊，做爲軍方治理參考。相關的討論俱見 Katsumi Nakao, "Japanese Colonial Policy and Anthropology in Manchuria," in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 p. 252, 257-259; 佐々木亨，〈滿洲国時代における觀光資源、展示對象としてのオロチョン〉，收入煎本孝編，《東北アジア諸民族の文化動態》（札幌：北海道大学図書刊行会，2002），頁 163-213。

³⁵ 槇林啓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考古・民俗資料の収集〉，收入岸澤知広、志賀市子編，《日本人の中国民具収集：歴史的背景と今日的意義》（東京：風響社，2008），頁 178-180。

³⁶ 滿洲建國初期對蒙古經略的討論，可參考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ロ——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頁 133-168。

月 3 日設置熱河省公署，熱河遂為滿洲國所支配。³⁷

有關熱河省的調查工作，也在軍事占領後展開。7 月 24 日，由早稻田大學德永重康（1874-1940）領軍的「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以下行文簡稱「滿蒙調查團」），從東京出發，開始所謂的「學術探險」。這同時是滿洲國頒布《古蹟保存法》後，日本學者首次大規模進行的現地考察。此次調查大抵有幾重意義：首先，它夾帶著武裝的力量進行。滿蒙調查團自遼寧省北票市為始，先後歷經凌源、灤平、赤峰、建平、朝陽等地，共費 80 日，最終在北平解散。該團所經過之地，湯玉麟部隊勢力尚未完全鏟除，基於「肅清治安」為由，遂有若干軍方人士隨行。《盛京時報》上明白指稱路途中「土匪頗多，殊為危險，故由陸軍將校及在鄉軍人等四十人，擔任警護」。³⁸

其次，調查團一行人的考察活動，實際上還獲得滿洲國方面之「官方特許」。他們經由神戶乘船渡至大連，先是前往新京，訪問了關東軍司令部、日本大使館，到國務院會見國務總理鄭孝胥（1860-1938）、實業部總長張燕卿（1898-1951），最後謁見「執政」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除了對開發滿洲國資源抱以期待外，雙方還針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如張燕卿與東京帝大教授中井猛之進（1882-1952）曾針對如何防止熱河森林面臨濫伐的弊端，交換意見。³⁹類似官方的支持活動，還從鄭孝胥替熱河境內最高峰平頂山更名、書勒峰巔紀念，又發給滿洲國旗充當行旌之舉可知。⁴⁰

再者，它不僅動員人文學者參與協助，還網羅了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礦物學、地質學等各領域專家前往。調查團的活動不僅象徵日本勢力得以毫無忌憚地「進出」中國，還藉由學術知識來連結帝國聲威，訴諸「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之體驗。根據調查報告表示，為了考察之必要，甚至動用無線電信設備及飛機等工具，將「文明利器」與「科學調查」加以結

³⁷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總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頁 444。

³⁸ 〈滿蒙學術調查團七月杪來滿調查〉，《盛京時報》，1933 年 6 月 25 日，第 1 版。

³⁹ 藤木九三，《熱河探檢記》（東京：東京朝日新聞發行所，1934），頁 10-17。

⁴⁰ 鄭孝胥時任滿洲國國務院總理，他後來書寫「天都峰」三字。參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總頁 2474，1933 年 8 月 2 日條。

合應用，是這次嶄新的嘗試。⁴¹所以說，該團可謂集結軍事、政治、文化三位一體之目標所進行的考察。

更重要是，嗣後滿蒙調查團根據考察結果，出版報告書數冊。此前有關熱河歷史的典籍文獻並不多，除了十八世紀朝鮮朴趾源（1737-1805）《燕行錄》涉及外，唯有西方建築學者和探險家曾經記載，⁴²其他方面所知相當有限。而熱河的「軍事勝利」對日本來說，無形之中產生諸多「便利」，得以逕入考察；報告書甚至提供了許多記載有關熱河文化的內容，儘管是內部發行的非賣品，卻相當暢銷。⁴³再者，此行也開啓一連串的文物調查活動之風氣，樹立起相關模式。經由滿洲國默許下，各種集眾式的現地研究，陸續於境內各處展開。

（二）從古物調查到「古蹟調查所」

細究熱河的調查活動，一方面既有軍事資源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對滿洲國本身深具政治象徵的意涵。尤其當地的史蹟遺址，不獨有清代離宮及其文物，甚至還包括了遼金時期的腹地，都有助於釐清中國征服王朝的歷史，藉此強化滿洲新政權統治之正當性。

1933年8月，一場熱河古物調查之旅於滿蒙調查團後不久展開。這次的主角是日人水野梅曉（1877-1949）與杉村勇造（1900-1978），兩人和近代中國的關係密切，也都參加過籌建滿洲國的活動。⁴⁴最初此行目的，係為調查

⁴¹ 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編，《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告·第一部總說》（東京：編者印行，1934），頁3。

⁴² 譬如跟隨馬戛爾尼（Lord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華的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 1781-1859），撰有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W. Bulmer and Co. for G. Nicol, 1797)，德國建築家柏石曼（Ernest Boerschmann, 1873-1949）的 *Chinesische Architektur* (Berlin: E. Wasmuth, a.g., 1925)，以及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的 *Jehol: City of Emperor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1932)等書。

⁴³ 1939年日人春山行夫參加「日滿中央協會」主辦的雜誌記者團滿洲國調查隊，行前便購買相關指南書籍，發現滿蒙調查團報告書原來定價50圓，卻以絕版而水漲船高，售價攀升為100圓。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東京：生活社，1940），頁4。

⁴⁴ 水野梅曉是廣島福山人，也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第一期學生，經常以僧侶身分辦理中日佛教活動。辛亥革命期間，他在南京開設臨時野戰醫院，營救交戰雙方傷兵，後又援助流亡的革命

文津閣本《四庫全書》行蹤，打算將來補入文溯閣本及《清朝實錄》的目錄，俾供出版之用。但整件事情立刻被滿洲國方面的相關人士知悉，要求加入工作行列，⁴⁵於是成爲日滿「文化合作」的先聲（詳下節）。與此同時，杉村又得自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的消息，據傳清代離宮內可能還存有其他重要的歷史文獻。因此，水野在杉村的建議下，決定從奉天出發，歷經 15 日抵達熱河承德。經過多方探尋結果，他們共同在避暑山莊內的珠像寺裡，發現了世界孤本的滿文《大藏經》，還見到雍正敕版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⁴⁶這次發現可說相當意外，成果豐碩；爲求順利將古物文獻運出，他們先是請求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協助，派兵「保護」，然後又以二晝夜的時間趕製目錄。接著，兩人更將原書帶回，自費印刷。⁴⁷

水野與杉村歸返後，也將成果呈報給滿洲國官方。不僅如此，兩人還積極獻策，主張籌募款項來修護當地古建築，藉此「彰顯勝跡」，追溯滿洲國與滿清的關係。⁴⁸於是乎，熱河遺址一經喧騰，頓時成爲炙手可熱的地點，引來許多建築專家紛紛到訪，開啓風氣。1933 年 10 月，日本的東方文化學院即派關野貞（1868-1935）、竹島卓一（1901-1992）兩人前往考察。他們總共花費了兩週時間，施行測量建物工作，還完成史料蒐羅、照片攝影，出版成四

黨人，與國民政府要人淵源甚深。比較值得一提，水野和復辟派關係亦匪淺，如鄭孝胥、羅振玉等，原因在「維護傳統道德文化及借外力維持中國秩序」的共識上，所以支持滿洲國建立。杉村勇造是東京人，爲滿鐵大連圖書館負責漢籍收藏特約人員松崎鶴雄的女婿，曾參與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工作，後又成爲「日滿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兩人事蹟分別見於陶德民，〈鄭孝胥與水野梅曉的交往及其思想初探——以霞山文庫所藏《使日雜詩》卷軸爲線索——〉，《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號 26（2005 年 3 月），頁 38-39；栗田尚彌，《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日中を架けんとした男たち——》（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3），頁 138；中村義等編，《近代日中關係史人名辭典》（東京：東京堂，2010），頁 323、538-539。

⁴⁵ 水野梅曉，《滿洲文化を語る》（東京：支那時報社，1935），頁 27-28。

⁴⁶ 杉村棟編，《八十路——杉村勇造遺稿集》（東京：編者印行，1980），頁 115。

⁴⁷ 杉村勇造，〈滿洲文化の追憶〉，收入社團法人國際善隣協會編，《滿洲建國の夢と現実》（東京：編者印行，1975），頁 289-290。

⁴⁸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總頁 2490-2491，1933 年 10 月 28 日條：「關野貞、水野梅曉、杉村勇造來，言熱河視察情形：政府宜歲籌二十萬元爲修保國內古建築之費……宜延建築專家繪圖、計劃，次第修理，以彰勝迹」。

大卷圖文並茂的書籍。⁴⁹影響所及，遂有滿洲國委託伊東忠太（1867-1954）設立「熱河古蹟特別調查所」（以下行文簡稱「古蹟調查所」）一事。

伊東忠太係明治到昭和時期著名的建築家與建築史家。⁵⁰他在東京帝國大學任教，一生致力於建立日本古典建築與亞洲之關係。爲了釐清日本建築的源流，伊東曾選擇到中國、印度、土耳其等地旅行，思索有關東亞建築史的課題。1935 年上半，伊東忠太接受滿洲國文教部之邀，前往熱河考察歷史建物。就在同年 5 月，他以「保存遺蹟」爲由，提出修復清代宮殿的計畫，打算以 10 年爲期，維修熱河至奉天之間的古建築，初步估計預算是 500 萬日圓，並由滿洲國方面支付。⁵¹當中爲了專責進行修繕事業，伊東忠太還特別向文教部提議，直接在現地設置「熱河重修工務所」。結果由於預算不足，幾經折衝後決定縮小規模，改爲古蹟調查所，由伊東擔任統籌。⁵²古蹟調查所前後一共維持 3 年經常性運作，最後直到 1943 年之際才正式決定停止事務。⁵³然而，該所工作範圍非僅限於熱河一帶的遺蹟文物而已；在滿洲國的各項建設事業裡，更擔任其他古建築的維修或新造宮廷的工事，並且肩負顧問之性質。透過這一特別成立的部門，滿洲國境內舉凡像是建國神廟、建國忠靈廟、成吉思汗廟、奉天體育館、滿洲國官吏養成所等工程，通通被納入到創造所謂「滿洲色彩」之一環，成爲具有特色的建築事業。⁵⁴甚至做爲唯一的建築專業技術團隊，古蹟調查所中的成員更被派往其他中國「占領區」，參與測

⁴⁹ 該書附有豐富的照片。見關野貞、竹島卓一，《熱河》（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4-1937）。

⁵⁰ 伊東的生平簡介，見中村義等編，《近代日中關係史人名辭典》，頁 63。

⁵¹ 岡村敬二，《日滿文化協會の歴史——草創期を中心に》（京都：作者印行，2006），頁 117-119。

⁵² 〈熱河建築重修計畫（伊東忠太）昭和九年七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錄》，檔號 B05015881800，「東方文化事業門講演視察及助成類：研究助成關係雜件第 7 卷」，<http://www.jacar.go.jp/>（2012 年 9 月 1 日檢索）；五十嵐牧太，《熱河古蹟と西藏藝術》（東京：洪洋社，1942），頁 184-198。

⁵³ 伊東個人的備忘錄記載了相關過程。見伊東祐信，《熱河古蹟：避暑山莊と外八廟の調査と保存》（東京：伊東知恵子刊行，1994），頁 3-9。感謝賴惠敏教授提供本書訊息。

⁵⁴ 原文係爲「特殊事業」，語自西澤泰彥，〈「滿洲国」の建設事業〉，收入山本有造編，《「滿洲国」の研究》（東京：綠蔭書房，1995），頁 434。

量現地建物之工作。⁵⁵

關於古蹟調查所之終極目標，不妨可從 1936 年 12 月伊東忠太的演講獲悉要旨。這篇回顧修建熱河遺址的文字中，伊東提出兩點構想，充分展現了其理念。首先，他從複合多元民族與文化的角度來談。伊東忠太強調：這些古蹟乃係融合漢、滿、蒙、回、藏各族之風格，實與中國內地的情況有所不同。一方面，它們承繼唐宋以來的傳統建築樣式，另一方面則吸收了元代起受到其他文化及宗教（特別是藏傳佛教）之影響，以異民族融合做為訴求對象。⁵⁶在廣納各種不同文化精神與基礎上，熱河古蹟的歷史經驗無疑提供了滿洲國示範，特別是透過建築如何展現文化融合的課題。換句話說，經由古物調查展現出不同文化的揉合風貌，無疑也將有助於現今滿洲國進行塑造「五族協和」之意識形態。至於另一種傳達多元民族的差異性，則進而鼓吹人們熱愛鄉土精神，甚至還促進不同地方各自的歷史認識。⁵⁷耐人尋味地，過去清廷亦運用類似手法，以承德打造帝國形象，聯繫長城內外農業和遊牧文化，打破隔膜，⁵⁸在滿洲國時期也得到若干類似的實踐。

其次是合理化關於古蹟文物的保存事業，演講內容之中不時投射出滿洲國扮演尋根的角色。伊東忠太形容，滿洲國致力於保存熱河遺蹟，等同進一步強化自身的認同，經由維護清朝歷代先祖基業來完成。既然溥儀有意要投

⁵⁵ 田中禎彦，〈滿州国における熱河古蹟の調査保存事業——日本植民地における歴史建造物の調査保存と異文化理解——〉，《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號 569（2003 年 7 月），頁 204。

⁵⁶ 伊東忠太，〈熱河の遺蹟〉，《建築雜誌》，輯 51 號 625（1937 年 4 月），總頁 500。

⁵⁷ 譬如，1933 年 7 月 12 日，興安總署亦針對轄境之內各蒙旗王公陵寢，認定為古物的一種，對考古及歷史均有價值，故速飭令各旗署由舊有陵丁中選擇人員，辦理看護事宜。又赤峰紅山地帶的考古挖掘，最後提出古蹟保存方法，建議縣當局經常與該地農村保持聯繫，預防古物流失與破壞，同時設立農村指導機關。俱見〈蒙旗王公陵寢有關考古歷史，令南分省加以保護〉，《盛京時報》，1933 年 7 月 17 日，第 2 版；〈彙報·赤峰紅山地方古跡發掘調查概要（二）〉，《文教月報》，號 3（1935 年 9 月），頁 56-57。

⁵⁸ 這方面討論，尤其引起近十幾年以美國學界為首的「新清史」學者所重視。其中，「夏都」承德富有多元的民族形象，更為焦點之一。代表著作如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入該項工作，那麼基於「日滿不分」的立場，日本便責無旁貸，無須擔心被看作是外國介入的問題，應該要鼎力支持。他甚至還強調說：持續滿洲的文化保存事業，才可進而凸顯東亞的地位，不致被笑為「蒙昧野蠻」之國。⁵⁹然而必須指出，伊東忠太的演講不僅凸顯自己有關東亞建築的見解，其實也反映了對日本現有情況的不滿。進一步說，亦即 1920 至 1930 年代日本流行混雜「日式」與「歐式」的建築風格，伊東抱持強烈地批判立場。因此，論者稱他是要假借讚揚熱河古蹟與建築，同時表現其反思的態度。⁶⁰

經上所述，熱河遺址調查於《古蹟保存法》的規範下，滿、日從各自的利益考量出發，努力維持合作事業。雙方唯一共同地著眼點，係以古蹟呈顯自身文化的特性，乃至追求文化融合（無論是「五族協和」，還是「日式」與「歐式」之別）之目的及典範。對滿洲國而言，此項工作還能藉此訴求緬懷清代祖宗，要求「各色人等一體恪遵」，⁶¹樹立統治合法性。至於日方進行相關考古遺址與調查活動，則是希望刻意淡化軍方色彩，避免被直指有「侵略」之嫌。⁶²

三、日滿文化協會的角色

探討滿洲國時期的古物調查，除了活動本身外，相關機構的建置過程也無法忽略，日滿文化協會即是其中之一。它的出現奠定於兩項基礎：首先，承繼於 1920 年代的「東方文化事業」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美

⁵⁹ 伊東忠太，〈熱河の遺蹟〉，《建築雜誌》，輯 51 號 625，總頁 502。

⁶⁰ 田中禎彦，〈滿州国における熱河古蹟の調査保存事業——日本植民地における歴史建造物の調査保存と異文化理解——〉，《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號 569，頁 206。

⁶¹ 例如：承德避暑山莊的外八廟「建自前清，迄今二百餘年，工程浩大，莊嚴可觀。所有廟內佛像、供具、樹株，以及廟外牆垣等項，均應嚴加保護，以重古蹟。誠恐遊覽人眾，或當地鄉民在廟內外有任意滋擾及其他不正當行為。茲由本署將注意禁止事項，開列於後，仰各色人等一體恪遵，勿違為要」。見〈各省紀事·熱河省公署佈告第 10 號〉，《文教月報》，號 1（1935 年 8 月），頁 67。

⁶² 譬如，1935 年 6 月東亞考古學會在熱河赤峰附近進行遺跡調查，成員有人提議利用軍機先行空中視察，但帶隊者原田淑人並不同意。見末永雅雄，《日本考古学への道：一学徒が越えた》（東京：雄山閣，1986），頁 765。

各國由於庚子賠款之關係，紛紛展開有關中國的文化教育工作；日本爲了培養親日人士，於是積極推動「東方文化事業」，補助留學預備教育、留學學費和文化團體，並籌設學術研究機構。⁶³但是，滿洲政權建立使得中、日關係緊張，而中國東北局勢出現嶄新的發展，迫使文化工作必須跟著有所區隔，另外嘗試單向「對滿」的活動，以別於對華事業。⁶⁴其次，爲了體現前述「滿洲」存在淵源及價值，訴諸建國的合理性。在此準則上，除了強化滿洲國與日本關係外，一面強調滿洲國步入安定之局，另一面則要「消化」軍事侵略後的果實。

（一）烽火中處理「逆產」

最初謀立文化機構或組織的想法，係爲擔任關東軍臨時顧問的矢野仁一（1872-1970）、羽田亨（1882-1955）等人。由於他們希望持續各項在滿洲的調查工作，因此特別聯繫了內藤湖南等京都方面學者，起草成立有關儒、佛研究機構的請願書。該項建議不僅廣獲迴響，更得到東京方面研究中國問題專家以及官員的支持，決定設置「國立文化院」。⁶⁵只不過，文化組織能夠進一步真正獲得落實，與其說來自少數人的積極推動，不如說是基於現況需要，特別跟處理「逆產」的問題有關。

《逆產處理法》原於 1932 年 6 月 20 日公布，⁶⁶目的是將關東軍所「接收」之各項資產移交給滿洲國政府。所謂「逆產」，概指張學良等東北抗日軍事將領之財產，以「罪跡顯著」爲由加以查封沒收。⁶⁷儘管處置「逆產」措施本來

⁶³ 「東方文化事業」實與戰後各國退還庚子賠款密切相關。這項文化工作籌設民間組織、團體，希望爭取親日立場的人物，相關論著已多，不詳述。請見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 113-207；S. H. Teow, *Japan's Cultural Policy toward China, 1918-1931: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阿部洋，《「對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戰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東京：汲古書院，2004）；山根幸夫，《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教育文化交流》（東京：汲古書院，2005）。

⁶⁴ 阿部洋，《「對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戰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頁 668。

⁶⁵ 關於這段曲折過程，詳參岡村敬二，《日滿文化協會の歴史——草創期を中心に》，頁 25-30。

⁶⁶ 里見甫編，《滿洲國現勢（建國——大同二年度版）》，頁 14。

⁶⁷ 這一批人物的名單有：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萬國賓、王以哲、張作舟、馮庸、張作濤、張學銘、馬占山、吳德林、張學仁、蘇炳文、張殿九、唐聚五、謝珂、李杜等人。見〈逆產と

爲了促使戰爭的侵略合理化，但由於涉及到古物保存及其所有權，因此備受注目。其中奉天方面，不得不提到居間負責協調的日人衛藤利夫（1883-1953）。衛藤原係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館員，1919年來滿鐵的附屬機構大連圖書館工作；因爲圖書業務所需，1920年又被指派出任滿鐵奉天圖書館主事，兩年後升任館長。⁶⁸「九·一八」發生後不久，東北各地接連有零星地抗日武裝衝突；對奉天當地文物典藏情況非常熟稔的衛藤，特別憂心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清朝實錄》安危，以爲將遭戰禍波及，於是委請滿鐵公所、奉天地方維持會出面警戒。未幾，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1883-1948）充任奉天臨時市長，下令「接收」文溯閣本。衛藤見狀，認爲有必要保護這些貴重文物，因此積極向關東軍參謀森糾獻策，建議以「逆產」的名義處理。⁶⁹

上述古物成爲「逆產」的過程，進而開啓後來滿、日有意籌組文化機構之構想。其實衛藤利夫的心目中，真正掛念是如何繼續在中國東北推展文化工作。1932年1月11日奉天大和旅館召開的「滿洲建國前夕日支名士座談會」上，他便主張要參考美國經驗，以「明確地意識形態及真誠夢想」爲治理原則；在任職滿鐵奉天圖書館館長期間，衛藤更是身體力行，蒐羅許多「東洋」典籍，包括翻譯外人遊歷東北的史料。⁷⁰跟衛藤利夫的情形如出一轍，在推動文化工作的過程中，處理古物產權逐漸成爲無法避免的課題，最後落實到設立日滿文化協會的共識上。

前一節談到水野梅曉、杉村勇造所進行的熱河古物調查工作，也爲成立文化協會帶來契機。因爲熱河考察活動，不免觸動了滿洲國的敏感神經，尤

して處分せらる者・その範圍大体決定・ここにも王道精神も發露》，《新京日日新報》，1933年2月25日，第3版。

⁶⁸ 村上美代治，《滿鐵図書館史》（滋賀：作者印行，2010），頁91-95；冷繡錦，《「滿鐵」圖書館研究》（大連：遼寧人民出版社，2011），頁190。衛藤是戰後日本知名國際政治學者衛藤瀋吉（1923-2007）之父。

⁶⁹ 衛藤利夫，〈文溯閣の危機〉，收入丸山泰通、田中隆子編，《衛藤利夫》（東京：日本圖書館協會，1980），頁215-218。

⁷⁰ 岡村敬二，《遺された蔵書——滿鐵図書館・海外日本図書館の歴史》（東京：阿吡社，1994），頁30-32。

其《古蹟保存法》剛推動不久，此一古物究竟隸屬何方所有？而滿、日兩國又該怎麼妥善處理產權，避免爭端？加上原來的「逆產」問題，在在都考驗雙方的外交關係，而設置文化協會毋寧為尋求其中「解套辦法」。

（二）非官方的「文化合作」管道

當文溯閣本的消息傳開後，杉村勇造立刻瞭解到當中的重要性，遂向日本外務省爭取經費，希望設立圖書館以利存放。⁷¹加上同時期水野梅曉也正規劃要吸納其他古物文獻，包括了羅振玉（1866-1940）長年典藏的「明清內閣大庫史料」等，設置國立博物館（以下行文簡稱「國博館」）。⁷²嗣後，這些想法遂一拍即合，化為實際行動，由時任滿洲國駐日公使的丁士源（1879-1945）親自寫信給水野，建議向鄭孝胥陳情，應「宜先立文化委員會，直屬國務院」，⁷³然後再謀設圖書館等保存單位。

大約從 1933 年初開始，組成文化教育機構的想法已經醞釀，原先是要求「日滿兩國民之親善融和」，以促成雙方相互視察、聯誼為目標，⁷⁴功能係在「合作」二字。直到 10 月 17 日，這一構想終於得到實踐，在滿洲國國都新京（今長春）召開日滿文化協會成立大會，緊接著連續三天進行活動，備受各界關注。結果就在會議展開、彼此進行意見交換之後，針對現況決定相關工作辦法。⁷⁵環顧其中內容，大致有兩方面的要點值得說明。第一項是那些屬於

⁷¹ 杉村棟編，《八十路——杉村勇造遺稿集》，頁 105-106。

⁷² 國立博物館係以湯玉麟宅邸改建，主要收藏張作霖父子藏品、熱河喇嘛廟所得的乾隆佛像，還有他人捐贈乃至各地蒐羅的古物（如羅振玉贈予中國歷代考古文物，以及杉村勇造挖掘到的遼代陶器等）。其中甚至還包括明清內閣大庫史料，是羅振玉從天津攜來旅順，後假借肅親王善耆的舊邸設置「庫籍整理處」，並「招處員十餘人從事整理」。據其後人所稱，乃因「1933 年秋天得資」緣故。俱見國務院文教部編，《第三次滿洲帝國文教年鑑》（新京：編者印行，1937），頁 45；大出尚子，〈「滿洲國」國立博物館の展示における「滿洲色」の創出——高句麗・渤海・遼の古蹟調査を背景として——〉，《內陸アツア史研究》，號 25（2010 年 3 月），頁 125；羅繼祖撰，蕭文立編校，《永豐鄉人行年錄》，收入羅振玉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附冊，頁 111。

⁷³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總頁 2471-2472，1933 年 7 月 21 日條。

⁷⁴ 〈設立日滿教育協會，經日滿兩國要人發起〉，《盛京時報》，1933 年 1 月 11 日，第 1 版。

⁷⁵ 〈滿日文化委員會第三日，籌議國立文化院〉，《盛京時報》，1933 年 10 月 21 日，第 4 版。

「逆產」的文物，後續應該如何處置，成為文化協會所要面對的課題和任務。譬如，本來關東軍規劃要成立國立奉天圖書館（以下行文簡稱「奉圖」），負責「接收」東北大學、萃升書院及散佚奉天清宮等各處的文獻圖書。該館打算推舉袁金鎧（1870-1947）、金毓黻充任正副館長，從事「蒐集關於滿洲國之歷史及地理之考古文獻」，目的要「闡揚我東亞之文化」。⁷⁶除了收藏文溯閣本外，奉圖甚至還擬有出版計畫，⁷⁷惟未終果。這些文物遺產嗣後遂由日滿文化協會接手，繼續統籌相關事宜。

第二項也是最重要的目標，日滿文化協會將以補助名義，支持任何滿洲、蒙古實地考察活動之費用，⁷⁸同時還要興建博物館設施，做為存放文物的地點。如前所述，日方最先有意成立「國立文化院」，然設此一機構理應隸屬滿方，恐非原意，故改以文化協會的形式考量。究其實，日滿文化協會不啻於在滿洲國政府的體制之外，另立一非官方合作渠道，以利開展任何「合法」的文化活動。

時任《盛京時報》主筆的菊池貞二（1884-？），特別撰文闡述日滿文化協會的成立意義；吾人亦可從中知曉該協會的角色，還有釐清「合作」之由。菊池文中即強調：之前張作霖父子統治時期，因「不解文事為何物」，純粹倚賴武力鞏固地位，而「此次滿洲國於軍事告一段落之日，邀請鄰邦碩儒，作文化之會」，毋寧有深遠影響。在發揮「文治」效能上，滿日文化合作刻意凸顯了並非屬於霸權的事業；他甚至提醒讀者，日滿文化協會中都是成色百分之「文化人」。⁷⁹如此說法意圖降低各方指責「侵略」的非難，合乎滿洲國自圓其說的立場。就像鄭孝胥也提到，協會「合作」之目的在於呈現所謂「學者合

⁷⁶ 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鑑》（新京：編者印行，1934），頁 749-751。

⁷⁷ 包括有下列項目：1. 刊行《四庫全書》未出版書四十種；2. 整理、研究及出版盛京六部檔案；3. 關於滿文老檔、漢滿兩種語文之歷代實錄的出版；4. 出版攸關滿蒙之文獻及蒐集「滿蒙叢書」等研究報告。見國務院文教部編，《滿洲國文教年鑑》，頁 749-751。

⁷⁸ 如：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5，總頁 3687，1935 年 10 月 13 日條中記載：「得杉村君函，余擬往丸都故地訪好大王碑，協會予以援助，將於日內成行」。

⁷⁹ 〈論說·滿日文化委員會〉，《盛京時報》，1933 年 10 月 19 日，第 1 版。

作」，而且「學者為道德、文學之所出」，相信透過「學者合作」，「乃真精神之合作矣」。⁸⁰由此可見，社論呼應了滿洲國官方的訴求。

菊池貞二進一步認為「文化」有助於滿洲新政權之建立；尤其要想從事「文化研究」，更需對現狀有充分地理解。他在社論裡指稱，像美國人楊克（Carl Walter Young, 1902-1939）所著之三部書《國際法上之關東州》（*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he Kwantung Leased Territory*）、《日本在滿洲特殊地位之研究》（*Japan's Special Position in Manchuria*）、《滿鐵附屬地政權》（*Japanese Jurisdiction in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Areas*），都可釐清「現代滿洲」之地位。可是這類書籍自「九·一八」以後，卻無法反映當前狀況，不免「喪失現代價值」；而日本與中國方面尚乏相關著作，故寄望此次「文化合作」，重新釐定滿洲國的地位。換言之，日滿文化協會的功能有其積極之政治意味，亦即進行「建設文化」的同時，必須扮演「強有力之文化機關」，主導各項事業的發展，「勿履所謂對支文化事業之泄沓故轍」。⁸¹

總之，日滿文化協會的建立，使得滿洲國之古物調查工作產生一套「合作」機制，讓日方師出有名，得以參與相關事業。至少在 1937 年以前，如此的合作事業不獨為一方獲益而已；即使是像傀儡政權滿洲國，也藉由得到清宮文物來強化自身地位。⁸²而日滿文化協會的「合作」事業，直至滿洲建國十週年之際更臻於巔峰。1942 年 9 月，該協會的常務主事杉村勇造居中牽線，假東京上野的帝室博物館舉辦「國寶展覽會」，特別展出了滿洲國數年來經過考古挖掘的物品，還有重要典藏。⁸³

⁸⁰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總頁 2482，1933 年 9 月 7 日條。

⁸¹ 〈論說·滿日文化委員會〉，《盛京時報》，1933 年 10 月 19 日，第 1 版。

⁸² 論者分析滿洲國立博物館收藏品的內容，認為初期日滿文化協會的考古工作與活動，大抵以呈顯「清朝色」為主，1937 年後則出現轉向。見大出尙子，〈日本の旧植民地における歴史・考古学系博物館の持つ政治性——朝鮮総督府博物館及び「満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館を事例として——〉，《東洋文化研究》，號 14（2012 年 3 月），頁 12。

⁸³ 岡村敬二，《日滿文化協會の歴史——草創期を中心に》，頁 183-190。「國寶展覽會」引來各界注目，即連遠在上海，對此也有相關的報導，見〈東京舉行滿皇宮展覽會〉，《申報》，1943 年 5 月 13 日，第 2 版。

四、以「東亞共榮」為目標的古物調查

闡明調查古物的合法性，除了滿洲國賦予建國理念外，不能忘卻日本帝國對生產殖民知識的用意。從「思想戰」的角度衡量，古物調查並非單純只是文治事業的代表而已，同時也是一種戰略考量。

（一）滿足「帝國想像」的地域研究

此一戰略特徵可從近代日本向外發展的歷史視之。爲了掩飾自己在東亞地區的擴張，日本以「道德」、「共榮」爲口號，倡籲團結東方民族，共同抵禦西方列強的殖民，企望超越以西方爲中心的「近代」。如此「亞洲主義」說法其實不獨日本有之，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梁啟超（1873-1929）、李大釗（1889-1927）、孫中山（1866-1925）等人亦有類似的關懷，⁸⁴但卻逐漸成爲1920年代日本的外交原則。首當其衝地，是有關殖民地的統治，以朝向「民族帝國」（Nation-Empire）之發展。⁸⁵有意思的是，如此反西方帝國的帝國主義，在面對「非正式帝國」之滿洲新政權時，則以迂迴的方式進行。簡單地

⁸⁴ 據近人分析，日本的「亞洲主義」源自1862年勝海舟（1823-1899）主張合縱連橫鄰近國家和民族，共同抵抗西洋文明和列強威脅。嗣後隨著論述者的立場和國際情勢的變化，內容則有所改變。像是日俄戰爭後，「亞洲主義」即以日本擔任東亞盟主爲前提，構築所謂「新秩序」。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東亞地區其他的國家、族群紛紛倡導「民族自決」，希望擺脫殖民統治，因此「亞洲主義」口號一時之間風起雲湧。惟不同處，中國方面展開「亞洲主義」的思考，儘管肯定聯合近鄰的弱小民族以對抗殖民霸權，卻也批判日本藉此名詞做爲「併吞中國主義的隱語」（李大釗）。至於「亞洲主義」的研究汗牛充棟，當中發展所涉及的地域不一，且內容相當複雜，此處無法詳述。筆者對中、日爭論的說明，主要參考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194-196；吉澤誠一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諸相〉，收入松浦正孝編，《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頁294-314。該書除了中國、日本的知識人以外，不少學者討論還擴展到朝鮮、印度、東南亞、伊斯蘭教世界等地區，而且時間上也從戰前、戰時延續至戰後之變遷，是最近集合了多位學者完成之「廣域比較研究」分析。

⁸⁵ 例如，山室信一便從法律統合及差別，勾勒日本帝國如何對殖民地民眾進行統治。見山室信一著，陳延媛譯，鍾淑敏校正，〈國民帝國日本的異法域統合與差別〉，《臺灣史研究》，卷16期2（2009年6月），頁1-22。

說，通過解除民族意識來達成塑造大和民族帝國主義之理想，或者更確切而言，是完成了日本帝國的「帝國想像」。

上述現象充分展現在「滿蒙」（以下行文省略引號）研究。滿蒙係指「南滿洲」及「內蒙古東部」；該名稱大抵源自日俄戰爭的勝利，由於日本希望確保中國東北的權益，故陸軍元帥山縣有朋（1838-1922）推動「大陸政策」，提出相關辦法。直到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協約〉簽訂後，衍生出滿蒙一詞做為「特殊權益」，由視為「生命線」的日本所沿用；日後松岡洋右（1880-1946）、石原莞爾（1889-1949）均以此來強調滿洲的特殊性。⁸⁶復次，研究滿蒙風氣與日本「東洋學」（Oriental Studies）發展有極為密切的關係。論者曾形容京都學派的東洋學傳統，一方面懷抱學術熱忱以解釋歷史外，另一方面也凸顯其藉由民族主義來塑造意識形態。⁸⁷其中，東洋學不同於傳統日本「漢學」，在方法論上強調科學的態度，注重整理原始材料，且通過田野考察來驗證；此外尚有更重要目標，即試圖追尋亞洲諸民族的歷史與文化關係。⁸⁸滿蒙研究便在東洋學基礎上，蔚為風潮。

開拓滿蒙研究的先驅學者，不可不提那珂通世（1851-1908）、內藤湖南、白鳥庫吉（1865-1942）三人。他們受到1904年日俄戰爭影響，將視野放在東北亞史上。像那珂通世翻譯《元朝秘史》，刊行《成吉思汗實錄》，關懷側重在朝鮮的外交問題。⁸⁹內藤湖南專研清朝史，不僅親往中國東北遊歷，蒐羅

⁸⁶ 貴志俊彥、松重充浩、松村史紀編，《二〇世紀滿洲歷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頁207；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頁13-16。關於陸軍與「大陸政策」的推展，尤其是「滿洲權益」確立方面，見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1906-191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頁21-32。

⁸⁷ Aida Y. Wong, "Dunhuangology as Nationalist Apparatus: The Kyoto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and its Connections with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Roy Starrs, ed., *Jap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At Home and in the Asia Pacific* (Folkestone, Kent: Global Oriental, 2004), pp. 252-267.

⁸⁸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47-67. 相關討論另詳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岸本美緒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3巻・東洋学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13-54。

⁸⁹ 那珂通世注意到《元朝秘史》，實際上與十九世紀末和中國學者交往有關，甚至受到晚清西北

奉天的清宮檔案，還據此編纂了《滿蒙叢書》。⁹⁰白鳥庫吉則對方法論有重大突破，主張古典文獻之外，還要結合地理學、語言學、宗教學、民俗學等，把舊問題賦予嶄新的解釋。這一套研究蹊徑別於以往的「漢學」知識傳統，並有意與歐美學界爭勝。白鳥深切地瞭解：西方無論關於中國、蒙古或中亞的研究，皆有長足發展，唯獨滿洲和朝鮮則未加開拓。因而基於就近取材的優勢，應該要極力鼓吹滿蒙及朝鮮研究。⁹¹

但是，滿蒙研究想要獨步於世界，並且超越西方學術，尚須以集眾之力量才能達成。白鳥庫吉在此發揮了極大地影響力量。1908年白鳥說服滿鐵總裁後藤新平（1857-1929），成立「滿洲及朝鮮歷史地理調查部」，實踐自己長期關懷，以團隊統合來進行研究。⁹²嗣後，歷任滿鐵的主事者利用現地優勢持續工作，成果豐碩。如由石川鐵雄主持的考察活動，在1922年時出版《滿蒙全書》；該書歷經長達30年努力下完成，內容非惟考察元、明、清三代有關東北的文獻，還進而完成現地調查。⁹³

等到滿洲國建立後，研究滿蒙的風氣配合殖民政策需求，有了更進一步之發展。如今隨著日人得以「進出」滿洲無礙，各種現地的考察活動跟著此起

史地的研究影響。見中見立夫，〈「元朝秘史」渡來のこ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開始とヨーロッパ東洋学、清朝「辺疆史地学」との交差——〉，《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4（2009年3月），頁11-19；和田清，〈我が國に於ける滿蒙史研究の發達〉，《東洋史論叢》（東京：生活社，1942），頁248。

⁹⁰ 周一良嘗謂內藤「所以致意清初史地之由來，仍不外日人經營我東三省政策之一面，觀滿蒙叢書所收東北史地諸書之解題，強半出先生手，斯可以窺其意嚮所在」。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史學年報》，卷2期1（1934年9月），頁155。

⁹¹ 引自松村潤，〈白鳥庫吉〉，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頁45-46。身為日本東洋史學的重要開創者，白鳥庫吉吸收西方的科學又與其競爭之態度，當然並非個案，例如以記者出身的橋樸（1881-1954）亦是一例。詳見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2（2003年12月），頁17-30。

⁹² 如箭內互、松井等、稻葉岩吉、津田左右吉、池內宏等。見小林英夫，《滿鐵調查部の軌跡，1907-1945》（東京：藤原書店，2006），頁42-43。

⁹³ 和田清，〈我が國に於ける滿蒙史研究の發達〉，《東洋史論叢》，頁256。有關編纂《滿蒙全書》的始末，見平山勉，〈滿鐵の調査と研究：その「神話」と実像〉，收入松村高夫、柳澤遊、江田憲治編，《滿鐵の調査と研究》（東京：青木書店，2008），頁38-40。

彼落，以「近代化」的知識推動有關侵略與開發工作，符合殖民治理之目的。據戰後中國學者的統計，「九·一八」至日人投降為止，東北考古活動歷經將近 77 次的挖掘工作。⁹⁴這些古物調查既有與西方學術一較長短的企圖，也扮演提供殖民知識的效能。其中，非但有解除民族意識的意涵，凸顯滿日「友好」的歷史淵源，甚至還促進了「東亞共榮」的思想；下略述之。

（二）做為殖民知識的古物調查

標榜東方學術的領先方面，像日本對「滿洲原人」的考古挖掘即為顯例。自從 1926 年瑞典學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於北京周口店發現原人、改寫舊石器時代的歷史後，考古活動於是成為塑造民族敘事重要的利器，⁹⁵因此東亞地區興起一陣熱潮，每有新發現便牽動學者之視聽。就在隔一年，旅居哈爾濱的俄國考古學者巴婁夫斯基（P. A. Pavlousky），也在扎賚諾爾煤礦中發現原人頭骨，並將挖掘成果發表在芬蘭的考古學期刊上引來關切。接著 1931 年春天，北平地質調查所的尹贊勳（1902-1984）也前往哈爾濱，採集到約為四世紀時的哺乳類動物化石群造成轟動。上述兩次由中、俄學者所帶動的考古發現，吸引其他國家相關領域的研究學者所注意，而中國東北登時更成為眾所矚目之焦點。等到滿洲國建立後，日本的東亞考古學會自然不願放棄如此良機，亦著手進行探勘活動，發掘零碎骨片。⁹⁶

1933 年 5 月，東北考古活動出現重大轉折。扎賚諾爾煤礦副礦長顧振權在工作無意間採集到原人頭骨，不久移交國博館保管。就在滿蒙調查團至新京謁見「執政」期間，團長松永重康還特地抽空前往哈爾濱顧鄉屯，實施化石

⁹⁴ 該統計見於安志敏，〈九一八以來日人在東北各省考古工作記略〉一文，分別在《益世報》1947 年的 3 月 11 日第 3 版、3 月 25 日第 3 版、4 月 1 日第 3 版。

⁹⁵ 北京原人成為整體中華民族的象徵，有關討論見 James Leibold, "Competing Narratives of Racial U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From the Yellow Emperor to Peking Man," *Modern China*, 32:2 (April 2006), pp. 199-206。

⁹⁶ 以上經過原委，均見佟柱臣，〈東北舊石器時代問題〉，《國立瀋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彙刊》，期 1（1947 年 10 月），頁 164-166。

層之勘查及挖掘，認為「發現人骨的可能性很高」。⁹⁷1934年秋天，日本東京帝大及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教授赤堀英三（1903-1986）前來滿洲見學，國博館特別請其觀覽。但赤堀判斷該頭骨類似百靈廟所挖掘的蒙古人頭骨，不能證實與舊石器時代的關聯；⁹⁸如此公開的定調，並無獲得他人認可。此學術公案歷經沉寂一段時間後，終於在1937年至1938年7月間，由參與籌組滿洲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遠藤隆次（1892-1969），接連在顧鄉屯進行兩次開挖，結果採集到牛、馬等化石，還有古代的滿洲人骨化石。⁹⁹「滿洲原人」的挖掘成績令日本學界深感自豪，該事件始末顯示日方「東亞考古」工作具有「先進」的發展，並且能在「滿洲新天地」上大顯身手；除了強調東亞學術發展的驚人成就外，頗有與西方學術爭勝之意。不獨如此，從考古活動裡甚至還刻意凸顯「東亞獨特文化」之溯源。¹⁰⁰以下要談的渤海國遺址與高句麗壁畫之發掘，更為此帶來最佳詮釋。

渤海國史課題始終係日本學者關注的面向。主要因素是這個曾經出現在東北亞的古國，不獨牽連著中國、朝鮮歷史，也與日本密切相關。因此1922年，朝鮮總督府組成朝鮮史編纂委員會，內藤湖南、服部宇之吉（1867-1939）受命擔任撰寫《朝鮮史》有關中國史料的顧問，¹⁰¹便對渤海國史投入極大地心血。內藤湖南甚至主張研究東北亞史地需將滿洲、朝鮮、日本視為一體，透過資料互證後恢復那些湮沒的事蹟；譬如他曾說：「在遼東不能得者，在朝鮮則往往得之，在遼東所得而定其究竟者，在朝鮮則得其旁證焉」。¹⁰²經由內藤的指引，許多日本學者也抱持共同的關懷及態度，包括稻葉岩吉（1876-1940）、

⁹⁷ 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編，《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告·第一部總說》，頁4-5。後來又在相關雜誌上強調這項觀點。見德永重康、直良信夫，〈哈爾濱の哺乳類化石の總括〉，《地質學雜誌》，卷44號525（1937年6月），頁536。

⁹⁸ 赤堀英三，〈北滿ジャライノール遺跡出土の新資料〉，《人類學雜誌》，卷54號3（1939年3月），頁95-100。

⁹⁹ 遠藤隆次，《原人発掘——古生物学者の満州25年》（東京：春秋社，1965），頁40-49。

¹⁰⁰ 水野清一，《東亞考古学の発達》（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会社，1948），頁4。

¹⁰¹ 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修會編，《朝鮮史編修會事業概要》（京城府：編者印行，1938），頁33。

¹⁰² 這段話引自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4，總頁2839，1932年7月11日條。

今西龍（1875-1931）等人，甚至能確切地運用朝鮮史料，對入關前的滿清歷史帶來許多創獲之見。¹⁰³

滿洲建國後，東亞考古學會以日滿「文化合作」為奧援，先後在 1933 年至 1934 年期間，兩次前往吉林省寧安縣西南的「東京城」，從事渤海國遺址的調查。第一次參加者為該學會成員，包括原田淑人（1885-1974）、池內宏（1878-1952）、駒井和愛（1905-1971）、島村孝三郎、水野清一（1905-1971）、外山軍治（1910-1999）等；而滿洲國方面人員則有金毓黻、金九經（1906-1950）。第二次活動則由原田淑人向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申請費用，加上矢島恭介（1898-1978）、三上次男（1907-1987）等考古學專家。¹⁰⁴兩次的考察成果，包含有《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址的發掘調查》報告書，還有水野清一、三上次男及駒井和愛共著的《北滿風土雜記》。根據報載，東京城遺址發現有城牆外廓、內城宮殿及寺院，並掘出泥佛與唐三彩，可證唐朝與渤海國互通貿易。此外，當地佛教藝術極為盛行，「觀龍泉府宮殿都市之構造，與陝西長安、日本之奈良京都，皆相彷彿」。¹⁰⁵至於《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址的發掘調查》結論則稱：渤海國和唐朝、日本、朝鮮新羅均屬佛教藝術圈，文化上互有交流，儼然為古代中國和日本文化交流相當重要的媒介；此次成果足以證實渤海國為當時東北亞唯一獨立的國家。¹⁰⁶

¹⁰³ 近人評價稻葉岩吉的「滿鮮史」研究，認為無法擺脫日本對殖民地支配的思考脈絡，也特別關注內藤湖南帶來的影響。寺內威太郎，〈「滿鮮史」研究と稻葉岩吉〉，收入寺內威太郎、永田雄三、矢島國雄、李成市等編，《植民地主義と歴史学》（東京：刀水書房，2004），頁 50-52；至於今西龍之例，可見內藤虎次郎，〈「百濟史研究」序〉，原載於 1934 年 3 月，收入神田喜一郎、內藤乾吉編，《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96-1997），卷 6，頁 319。此外，時為清華大學學生的夏鼐（1910-1985），曾經比較過稻葉岩吉著作與蕭一山《清朝通史》，深感稻葉氏更勝一籌。這樣看法頗呼應多元史料解釋歷史的態度，得到年輕一輩喜愛。夏鼐，《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冊 1，總頁 183，1933 年 7 月 28 日條。

¹⁰⁴ 這兩次的調查經過原委，可參考酒寄雅志，〈東亜考古学会の東京城調査〉，收入菊池俊彦編，《北東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10），頁 191-211。

¹⁰⁵ 〈吉林「東京城」調査之發現，渤海國古都遺踪宛在，原田東大教授考古學班談〉，《盛京時報》，1933 年 7 月 2 日，第 7 版。

¹⁰⁶ 東亜考古学会編，《東京城：渤海国上京龍泉府址の発掘調査》（東京：編者印行，1939），頁 87-89。

至於高句麗壁畫，則為 1935 年安東省視學官伊藤伊八在輯安縣發現。輯安原名「通溝」，是貫穿通化省交通梅輯線的終點，與朝鮮的滿浦鎮隔著鴨綠江遙望相對。它原係高句麗時代的都城，附近有許多古墓群。最早在 1905 年和 1913 年期間，鳥居龍藏（1870-1953）、關野貞兩人分別親自到訪，惟以當地充斥「匪賊巢窟」、治安未佳及交通不便緣故，未有進行具規模的考古調查。直到 1935 年這次的消息傳開後，日滿文化協會於是委派池內宏、濱田耕作（1881-1938）、梅原末治（1893-1983）等人前往勘察，最後決定組織「輯安古蹟保存會」。¹⁰⁷該保存會更擬具計畫書向滿洲國中央呈報，希望獲得修葺古蹟文物之補助，後來中央遂通令安東省長撥給工事費 1,500 元，並要求迅速施工。¹⁰⁸

渤海國遺址及高句麗壁畫的發掘，儘管填補了以往學術研究的缺漏，然而調查工作本身毋寧也符合日本「國策」所需。質言之，透過宣揚渤海國史、日渤交流史，一方面尋求歷史根據，強化「日滿」友好的古代淵源，另一方面也避免日本遭到世界各國對其扶植滿洲政權的非難，從日、渤關係之中締造滿洲建國的名分。¹⁰⁹在 1934 年關野貞的一篇演講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類似的態度。他說：滿洲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無疑是所謂的「塞外民族」；一般說來，塞外民族處於落後的情況下，只有模倣中國文化，故其遺蹟文物並無特別之處，但經實地調查後，發現情況不盡如此。關野檢討了各處發掘出來的古蹟文物，認為這些塞外民族在模倣之外，又具有其特殊的風格與性質。他甚至歸結到滿洲國內的各種古建築、古墳等，時限範圍從漢代至遼金時期為止，實際上都屬於東洋文化之珍貴遺產。¹¹⁰雖然這場演講尚在滿洲國官方

¹⁰⁷ 濱田耕作，〈旅の女の話〉，收入濱田耕作著作集刊行委員会編，《濱田耕作著作集》（京都：同朋舍，1993），卷 7 青陵隨想，頁 354；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1），頁 1121。

¹⁰⁸ 〈指令·文教部指令第 281 號〉，《文教月報》，號 3（1935 年 10 月），頁 29。

¹⁰⁹ 酒寄雅志，〈東亜考古学会の東京城調査〉，收入菊池俊彦編，《北東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頁 210；東北亜歴史財団編，赤羽目匡由等譯，濱田耕策監譯，《渤海の歴史と文化》（東京：明石書店，2009），頁 422-423。

¹¹⁰ 關野貞的舉例中，包括輯安高句麗古墳中的散蓮花塚，主張它們與中國的南北朝情況相異。見

設置「輯安古蹟保存會」之前，但說明古物調查聯繫的政治性意義，則不言而喻。

這樣強調「東亞文化的源流」，非惟展現了如何解除民族意識，也說明日本藉此來達成其「帝國想像」。尤其面對非官方的統治，日本殖民當局需要建立一「道德門面」，考古學知識遂為殖民政策的一環。1941年珍珠港事變前夕還有篇文章，特別以「學術的論證」來思考所謂「東亞文化的源流」，同時亦做出了最佳詮解：

我們敢斷言東亞文化的源流，古代文化是以中國為中心，以滿洲、朝鮮為橋梁，向日本群島輸出，可以說是由大陸向海洋傳播；近代文化是以日本為中心，以朝鮮、滿洲為橋梁，向中國輸出，亦可以說是從海洋向大陸傳播。兩千年的悠久歷史，造成中日滿三大民族文化的交流，隨著時代的演進，歷史命運的發展，由於中日滿文化的一體，導致經濟的有無相通，進而促成政治上的相互協助，典〔奠〕定東亞文化本位的大聯合，與西洋文明相抗衡，向建設東亞新秩序大道邁進，已成為東亞文化協進的最高指導原則。¹¹¹

該篇文章舉證之例，是漢代文化傳到滿洲、朝鮮地區，然後影響到日本。其中內容高唱「東亞」、「中日滿文化一體」，雖與1940年8月日本首相近衛文麿（1891-1945）宣揚「大東亞共榮圈」不無關聯，但可溯自滿洲國初期的古物調查及殖民工作，乃至更早的滿蒙研究上。

五、「協力」參與人員之心曲及轉折

日本的滿蒙研究中具備高度政治性質之意涵，儘管引來中國學者強烈反

關野貞，〈滿洲の古建築と古墳〉，《支那の建築と藝術》（東京：岩波書店，1938），頁357-394。
¹¹¹ 閻琴，〈由三國國交成立想到中日滿文化的源流〉，《三六九畫報》，卷12期10（1941年10月），頁3。個別標點偶有更易；此處所謂「學術的論證」，是該文強調的訴求。

擊，但其研究精神與成績，確實讓人產生「愛恨交織」之複雜情感。¹¹²與此同時，那些參與古物調查工作的「協力者」（collaborator），所反映的態度又是如何？這將為本節想要進一步探討的內容。

研究傀儡政權下民眾的合作心態，一直充滿高度困難；協力者在面對殖民強權時，怎樣安身立命，並合理化自我的行為？尤其近代帝國主義殖民之際，又夾帶「文明」開發做為口號，使得被殖民者經常陷入二元對立的思考之中，到底前者帶來的是「侵略」、「破壞」，還是所謂「進步」的力量？要瞭解其中千絲萬縷之關係，許多學者從後殖民視角進行反思。梅塔烏（Uday Mehta）和杜贊奇兩位分別檢視那些超越民族主義的普世價值，認為是吸引協力者之因素。¹¹³不過，近代日本對東亞地區的殖民，可能還有更為複雜的面向。誠如入江昭探討中日戰爭時指稱：日本利用「新民會」與「王道思想」做為侵略及占領中國的藉口，雖然未必完全達到目的，可是當中鼓吹反西方列強與提倡「亞洲主義」，卻在思想界具有相當的力量。¹¹⁴再以身處滿洲國的日人為例，儘管「知識」可以成為文明認知或統治策略之一，但實際操作的情況恐非如此。¹¹⁵

¹¹² 以 1922 年《滿蒙全書》為例，有位讀者投書說「當時我看見了，使我驚喜交集。我驚的是日本人的野心，是日本研究我們國情的精神；我喜的是我們這般『不出門而欲知天下事』的黃帝子孫，不注重考察，不洞悉國情，而喜歡狂談革命、高唱救國的中國人，偷閒地坐著又得到一種關於研究滿蒙的資料」，可以窺知其心態一斑。見龍冠海，〈書報述要·滿蒙全書〉，《清華週刊》，卷 30 期 4（1928 年 10 月），頁 46。

¹¹³ 梅塔烏注意到 18-19 世紀的英國自由主義思想，並沒有隨著帝國擴張而互不相容，反而獲得向外發展的機會。杜贊奇則從萬國道德會入手，探討滿洲國時期現代性如何藉由婦女和傳統的形象來獲取民心。見 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 Modern*, pp. 131-169。

¹¹⁴ Akira Iriye, "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 The Hsin-min Hui," in Akira Iriye and Madeleine Chi eds.,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54-274.

¹¹⁵ 玉野井麻利子曾對移民至滿洲的日人進行口訪與文獻調查，發現他們生活在滿洲建國期間，未必真的就像官方提出「五族協和」口號那樣，充分融入族群政策與安排之中。相反地，這項口號卻間接凸顯了殖民者的恐懼和焦慮，說明在脆弱政策之下，所能展現的統治力量。Mariko Asano Tamanoi, "Knowledge, Power, and Racial Classifications: The 'Japanese' in 'Manchur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2 (May 2000), p. 271。

饒富興味地，受到近代中國政權更替所影響，滿洲國時期參與考古「協力」人員的心理轉折，往往語焉未詳，缺乏足夠的資料佐證。後人面對如此的情形，泰半僅能從蛛絲馬跡裡尋求合理解釋。以下即以金毓黻和李文信為個案，嘗試分析他們的態度。選擇金、李兩人的主要理由，除了他們曾經參加滿洲國古物調查工作外，更重要是還在歷經不同政權之際都保留下紀錄。這些文獻固然不無竄造之可能，未必完全反映當時情境，惟對釐清其歷史脈絡仍具有一定的意義。

（一）金毓黻的「自白」

一向關心東北史地的金毓黻，在張作霖主政時期追隨臧式毅（1884-1956），曾經擔任奉天省府廳委。由於工作關係，金氏常有機會接觸日人。然而，對日方積極鑽研滿蒙之現象，他並非純粹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看待；相反地，有關日本學者素來編纂史料之苦心，反而表示讚佩。如金毓黻日記嘗寫道：「諸君子嗜古情深，樂而為此，亦非盡出於嘗爨問鼎之心也」。¹¹⁶此外，像是稻葉岩吉研究遼東及朝鮮甚富心得，金氏時常向他請益，日記中也屢見彼此相訪的紀錄。

「九·一八」事變發生，金毓黻與臧式毅共同被關東軍憲兵隊囚禁。這段長達 90 日的牢獄歲月，讓金氏心中留下陰影。不僅如此，日軍為了冀求金毓黻效力，更採取軟硬兼施的勸說，派予省府參議一職，並威脅如不應命，即為反日。後來金氏的〈瀋陽蒙難記〉描述到：關東軍有意將他加以困羈，結果以「惟喜讀書答之」，應允出任奉圖副館長的工作。¹¹⁷嗣後，金毓黻每以消極的心態應對日方各種要求。1935 年春天，以「為母奔喪」為由的他決定常住遼陽；適值服部宇之吉、池內宏、羽田亨等人前來，金氏於是託名研究，赴日留學。兩年後金毓黻順利逃脫，隱姓埋名潛至上海。

¹¹⁶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4，總頁 2485-2486，1930 年 8 月 24 日條。

¹¹⁷ 該文為 1937 年 2 月的事後補記，現收入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4，總頁 2657，1931 年 9 月 21 日條。

〈瀋陽蒙難記〉係金毓黻向南京國民政府輸誠時的憶述文字，日後抄錄在日記上，體例略近於「自白書」，其中內容多半描寫於已有利的地方，不無脫罪之嫌。即便是今日所見排印本《靜晤室日記》，因非原來手稿，也很難斷定是否經過竄改，或對滿洲國時期自己之作爲有所掩飾。然而，金氏日記仍保有若干程度的可信成份，值得仔細推敲。以 1930 年代的文字而論，有兩處與本文題旨有關。一是他曾經參與日方考古活動，特別係渤海國遺址調查工作的紀錄，乃至於表達自己對日本學者的態度；另一爲和傅斯年（1896-1950）互動的前後轉折，包括自己編纂《遼海叢書》、撰寫《東北通史》所揭櫫的精神。

由於關注東北史地研究，身爲奉圖副館長的金毓黻，特別留心當時考古活動的最新發展。有意思的是，他在日記裡寫下：「近頃日人極注意渤海古蹟，此次所獲殊倍於往昔，且可證明渤海通行文字仍爲漢文」，¹¹⁸顯然字裡行間對於日方調查的成果有所保留。1933 年夏天，金氏則應東亞考古學會邀請，前往東京城考察。日記中他說道：

……余赴東京城考渤海國遺蹟，時地方不靖，途程孔艱，友人多尼余行，余久欲往是地，以為機不可失，乃決計一往。聞東京城一帶，匪氛方盛，前十數日又將東京城焚掠，乃於此時臨不測之地而從事考古，思之亦良可笑。然學問之道，日新月異，心摹手追，猶懼弗及，先民遺蹟埋藏地下，歷千餘年，蘊而未發，後人乃景附以隻詞賸義，往往不得其實，而於渤海國尤甚。先民有知，方需余輩之探討開發，必能為之默佑，而余輩亦不憚冒險阻而一入之，此余所以終有此一行也。¹¹⁹

這段話亦頗有自道心曲之意。東北史地是金毓黻長期的研究關懷，故願意甘冒「親日」的質疑及道德愧疚感，乃至排除治安危殆因素而冒險一試。顯然對學問事實的追求要高於其他一切，是金氏願意參加調查活動的心態。這一點另也

¹¹⁸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4，總頁 2909，1932 年 12 月 2 日條。

¹¹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4，總頁 3068，1933 年 6 月 1 日條。

可從他編刻《遼海叢書》，「遇恭避字皆不缺筆」，被人誤為「不敬」的情形中推知。¹²⁰只是日記裡所談的內容，遠不及金氏考察金朝建都之地——白城，朋友形容他眼見「歷今七百餘年，皇城宮殿，殘痕猶在，賭〔賭〕之不禁滄桑之惑〔感〕」，¹²¹還要來得直白。

任職奉圖副館長期間，金毓黻輾轉讀到傅斯年等人編寫的《東北史綱》（實際上只有發行第 1 卷古代之東北）。傅氏當時為中國最高學術機關——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也是位極具濃厚民族情感的史家。《東北史綱》是傅氏眼見日本發動侵華戰事、片面支持滿洲政權後傳達的不滿；該書聯合其他的青壯學者共同撰寫，代表國家立場發聲，進行一場「文化戰爭」，是「救國」心態下完成的作品。¹²²金氏初步閱讀的印象是覺得該書「大抵取材於東籍，極似稻葉氏之《滿洲發達史》，特異其旨趣，而稍增其內容耳」。¹²³等到完全觀畢後則「毀譽參半」，失望的地方是書中「所下斷語雖多新義，亦不免有粗疏之處」，與傅氏學術聲望名實不符，且筆法文白交雜，致使「蹇澀難讀」；稱譽之處則係每每有獨到見解。¹²⁴

整體說來，生活在滿洲國統治下的金毓黻，為求政治避禍而獻身於學術事業，盡量忽略兩者的關聯性。然而，直到逃離日人掌控後，金氏則是將東北史的學術專長與關懷加以發揮，投射到政治立場與民族情感上。1937 年初，他先是將寫好的三卷《東北通史》書稿呈送傅斯年，企盼獲得重視，「在

¹²⁰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5，總頁 3538-3539，1935 年 3 月 8 日條。

¹²¹ 谷鐵錚，〈同金靜菴先生白城考古〉，《盛京時報》，1933 年 7 月 28 日，第 11 版。

¹²² 「文化戰爭」語自陶希聖的看法，該書當然也引起其他中國學界不同的聲音。相關討論見 Fan-sen Wang,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49-152; 清水美紀，〈1930 年代の「東北」地域概念の形成——日中歴史学者の論争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植民地研究》，號 15（2003 年 6 月），頁 45；葉碧苓，〈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史學界對日本「滿蒙論」之駁斥——以《東北史綱》第一卷為中心之探討〉，《國史館學術集刊》，期 11（2007 年 3 月），頁 120-121、127-129；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o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pp. 127-133。

¹²³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4，總頁 2916，1932 年 12 月 13 日條。

¹²⁴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 4，總頁 2999-3001，1933 年 3 月 1 日條。

研究院求得一席，專攻東北歷史、語言」。¹²⁵傅氏素以民族大義論人治學，曾對那些投奔滿洲國的「走胡」學者表示深惜，¹²⁶而金毓黻個人投歸之舉，不啻為象徵指標，更是重要代表。

歷經「重生」的金毓黻，書寫東北的內容聚焦於漢族正統中心主義，關懷的是中國整體，而非局部。如《東北通史》解題中，他說到「東北民族至為復〔複〕雜，極費分析之功，而其影響於中國全部者亦極巨」，「夫史之為體，有分有合，有橫有縱。自縱的一面言之，則有斷代史；自橫的一面言之，則有國別史、地方史，此皆極分析之能事者。然無論其為斷代、為國別、為地方，而皆為整個中國史之一部，是則撰述東北之職志，當亦不外是矣」。¹²⁷尤其種族議題上，金氏多處表示支持中華民族觀。他認為梁啟超劃分國民和民族之別，業已不符今日新義，「梁氏之所謂民族，今則謂之種族；所謂國民，今則謂之民族」；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今茲之中華民族據此理由而構成之，亦與梁氏所謂國民有同一之涵義也」。¹²⁸類似採取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可見於標題〈孔子與東北〉一文。金毓黻在該文指出：孔子是殷商遺裔、微子之後，特別強加比附殷商民族出於東北，則孔子之先祖亦必出於東北。換言之，東北民族無異於中國共同始祖之根源。¹²⁹

民族情感凌駕於研究之上，金毓黻的學術態度因政治立場而改變，也可從日後其他的活動中看到。1939年6月，金氏隨著中央大學搬遷至大後方國統區。該校歷史系系主任朱希祖（1879-1944）鳩合師生合作，以四川省為範圍從事各項考古工作；結果金毓黻、劉節（1901-1977）、繆鳳林

¹²⁵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5，總頁3956，1937年1月11日條。當時金氏在南京中央大學授課，還寫一封信表明「願在貴院得一地位，希望不高，只求維持生活」。見〈金毓黻致函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檔號元235-28。

¹²⁶ 譬如吳廷燮（1865-1947）個案，傅斯年曾表達過類似想法。見〈傅斯年致蔡元培（1934年10月5日）〉，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卷2，總頁633-634。

¹²⁷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6，總頁4167，1938年6月3日條。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¹²⁸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6，總頁4518-4519，1940年3月31日條。

¹²⁹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6，總頁4541，1940年4月21日條。

(1899-1959)、常任俠(1904-1996)等人的帶領下，他們在中大臨時校區農學院、嘉陵江與磐溪附近，先後發現了三處石棺古墓。¹³⁰這項考古挖掘的成績發現皆屬漢闕，證明了巴蜀文化早已受漢代風俗影響，¹³¹所以轟動學界。由此不難想見，考古工作適時亦成爲抗戰建國、增進民族文化信心的科學事業，¹³²從而獲得堅定形塑「中華民族是一個」之確證。¹³³不獨如是，對於與宋代同時期的遼、金征服王朝，金毓黻更以「民族正統」爲見解，批判姚從吾(1894-1970)書名《遼宋金元史》，不該謹守開國的時間次序，「以外族加於中國之上」。¹³⁴此後他的學術興趣與政治信念，猶如傅斯年個人一樣，牢不可破地緊緊結合起來。

(二) 李文信的「反正」

相較於金毓黻，李文信的例子顯得更耐人尋味。李氏本爲遼寧省復縣(今瓦房店市)農家子弟，既無顯赫地出身背景，也沒有政治奧援。1927年6月，他考入奉天教育會所創辦的美術學校國畫科；儘管自承「學美術不是我的志願和專長」，「喜歡的是文學和史學」，但由於藝術鑑賞力所致，「漸漸地有了專學歷史和古器物學的志願」。就在10年後滿洲國統治時期，李文信學以致用，幸運地被調入國博館工作，隨後擔任學藝官佐，開啓考古工作和事業。¹³⁵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前，有關日本與滿洲國在東北的考古活動，李氏幾

¹³⁰ 常任俠著，郭淑芬整理，沈寧編注，《常任俠日記集——戰雲紀事·上(1937-1939)》(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2)，頁413、417，428-429，1939年5月13日、20日，6月12-13日各條。

¹³¹ 金毓黻，〈中大歷史學會試掘史蹟紀事〉，《說文月刊》，卷3期4(1941年10月)，頁58-59。

¹³² 這句話原是常任俠在戰時演講「考古與抗戰建國」所說。本來意思是：「考古係一科學，抗建須科學，而考古對於民族文化尤重」。見常任俠著，郭淑芬整理，沈寧編注，《常任俠日記集——戰雲紀事·上(1937-1939)》，頁426，1939年6月4日條。

¹³³ 「中華民族是一個」乃源自顧頡剛在1939年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恰巧跟中央大學在四川省的考古活動相互輝映。該篇省思民族關係的文章有其複雜的背景，無法在此詳述，筆者打算另文說明。至於顧氏一文，請見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寶樹園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4，頁94-108。

¹³⁴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冊6，總頁4632，1941年1月2日條。

¹³⁵ 這段生平經過，均見於李文信，〈「自傳」摘錄〉，《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訂本)》(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頁838-839。

乎無役不與，深諳其中情形。

李文信非但熟悉考古工作的作業程序，也曾高聲疾呼要重視這些活動。1939年5月，身為滿洲國國民的他，特別撰文提倡關於史前的發掘及考證，認為「必須國民全體動員」，端賴少數專家是絕對不夠的。李氏還說：「吾輩處此文化寶藏環境中，正好及時努力學問，以滿足精神之要求。況考古學趣味豐富，價值高尚，不特一般人愛好而願研究之，即中小學生亦莫不聞獵色喜，躍躍欲試。吾國考古學之提倡，無論在古文化整理上、國民精神之作〔振〕興上，皆為必要。故筆者不揣翦陋，草成此稿」。¹³⁶這篇連載於報紙的文字，看似彷彿像是政令宣傳，其實也蘊藏著自己對考古的熱情，還有對於普及知識文化的觀感。

從現有已刊、未刊的調查日記裡，可以看到李文信對日方考古學者孜孜不倦所獻出的努力，深表激賞。譬如，熱河省喀喇沁右旗轄境的葉柏壽驛溝內，因進行水道工程而發現遼代磚室古墳，故1940年6月滿洲國民生部委託三宅俊成，率領園田義範、李文信前往調查。不久李文信將日記公開，內有許多描述「文化交流」的情形：

晚膳後驛長偕同僚二〔人〕來訪，並觀吾等昨日所採之石器陶片等，聽取三宅博士誠懇之說明，似極感趣味，亦可見友邦人士學術之熱心及態度矣。¹³⁷

又如：

午後同三宅博士率本驛各科系熱心人士及小學校師生全部，到五臺溝石器文化遺蹟及遼代遺蹟地採集。某君採得雙孔石庖刀一枚，磨製滑潤，完美可愛。餘人亦各有收穫，小學生精神更見旺盛。文化國民之動作及精神，使人自愧。吾同胞可以見賢思齊，勿自怠棄矣。¹³⁸

¹³⁶ 李文信，〈滿洲史前考古學上之基礎知識（十八）〉，《盛京時報》，1939年5月24日，第4版。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¹³⁷ 李文信，〈葉柏壽行紀〉，《國立中央博物館時報》，號9（1941年1月），頁35。

¹³⁸ 李文信，〈葉柏壽行紀〉，《國立中央博物館時報》，號9，頁37。

再如：

三宅博士午後亦往驛西丘陵地帶採得大型磨製石斧等數種，皆為向所不知者。三宅博士之功績，不可沒也。今日驛長命工人開始作古墳保存工作，將來葉柏壽驛中添一史蹟，乃極有意義之事。此一端已可見友邦人士對文化事業關心之程度若何矣。吾人對之能不感愧。¹³⁹

倘使認定這是李氏刻意以文字表現日滿合作的「和諧」，那麼解釋上不免失之表象。同樣在 1943 年的和龍縣西古城子調查之中，未刊日記上也寫著：「西古城子國民學校學生約 80 名，雖為四年女生，以面盆加項運搬積土，非常整齊規律，且皆歡喜誠心工作，進行頗速。先生平海君，亦指導有方，學生皆無勞苦倦容，使人感激不止，較滿系女學生不可同日而語矣」。¹⁴⁰平海是位日本老師，而國民學校同學講的是日系女學生，仍有深感日人熱衷文化工作、傳達對日親善之意。

這些考古通信、報告書的文字，固然表露出李文信的親日態度，惟亦有與殖民當局的意見相互抵觸之時。例如 1942 年 5 月，李氏參與遼陽的漢墓考察；後來日方決定將所有發掘的古物暫運至東京帝大，進行整理和研究。可是李氏對如此情形卻表反對，主張要保存在中央博物館或陳列於遼陽古物保存所，「蓋遺物不能離遺蹟地而仍保有其全部價值也」。¹⁴¹換言之，體認到文物的「在地性」意義，恐怕才是李文信對考古活動所抱持的熱情，也是他願意「協力」參與調查工作最重要之目的。這一信念甚至直迄二戰結束後未嘗改變。當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東北期間，李氏還轉化成爲「地方意識」，改以訴諸東北一地的重要。在 1946 年的一篇關於吉林市古物報導中，李文信特別呼籲大家要重視東北以往古文化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遺蹟文物之發現，足以改變人們對中國的想像和理解。李氏在這篇文字裡，反省執政當局

¹³⁹ 李文信，〈葉柏壽行紀〉，《國立中央博物館時報》，號 9，頁 38。

¹⁴⁰ 李文信，〈1943 年和龍縣西古城子調查日記〉，《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訂本）》，頁 622，1943 年 5 月 6 日條。

¹⁴¹ 李文信，〈遼陽漢代文化調查通信（續）〉，《盛京時報（晚刊）》，1942 年 6 月 2 日，第 2 版。

「素忽邊疆之研究」的嚴重性。¹⁴²

儘管戰後政權移轉，李文信仍然持續地推動中國東北的考古工作，並且成爲傳承此一事業最重要的推手。¹⁴³然而有意思的是，起初尚無任何批判日人考古活動的他，卻在中共建政後公開斥責日方。當韓戰爆發，意識形態業已成爲冷戰時期相互抗衡的武器之際，李氏重新喚起了以往考古工作的記憶，細數每一次自己曾經和日本學者的發掘活動，然後冠上「文化侵略」之惡名。1951年，他正式發表〈日寇在東北文化侵略的罪行〉一文，聲稱「今天美帝正要武裝日本，我們文化工作者必須正視這一問題」。這篇長文內容還憶述1945年前東北地區的考古工作，說日本「一方面偽造歷史、抹殺歷史，來麻醉我們的民族國家意識，妄想割斷東北與中原的歷史關係，建設他們的所謂『滿州』史觀，來作他侵略東北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就有組織有計劃地來毀滅歷史遺跡，掠奪大宗文物，打算使我們後代也永久失掉民族歷史觀念」。¹⁴⁴一位熟稔滿洲國古物調查始末的人，基於「政治正確」因素瞬息轉變其立場，同時隱藏了他過去所曾稱頌日人的那一面。

結 論

本文以古物調查爲例，探究滿洲國在日本帝國殖民史上的角色，進一步勾勒帝國主義與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誠如開頭所述，日本與傀儡政權滿洲國的關係，絕非「殖民」與「侵略」二語所能簡單道出。以保存古物這一點而言，隨著1930年代東亞地區民族國家主權意識的高漲，維護古蹟文物的活動蔚爲風潮，無異提供滿洲國立法之先決條件，因此開啓了調查事業。雖然古

¹⁴² 李文信，〈吉林市附近之史蹟及遺物〉，《歷史與考古》，期1（1946年10月），頁22。

¹⁴³ 身爲遼寧省滿族的閻文儒，抗戰期間大部份隨著向達在西北進行考古。戰爭結束後，他也參加東北的考古活動，曾表示主其事者都是日本人，而且「李文信先生幾乎每次都要參加的；所以日本人走後，我們並不覺得如何困難」，由此可知李氏的角色及意義。文儒，〈編後〉，《歷史與考古》，期1（1946年10月），頁117。

¹⁴⁴ 李文信，〈日寇在東北文化侵略的罪行〉，《文物參考資料》，卷2期9（1951年10月），頁202。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物調查工作本身具有其他軍事和政治目的，可是卻又符合日滿雙方各自所需。對日本來說，熱河古蹟及自然科學的考察，一方面藉此肅清抗日勢力，並且探詢各項資源，另一方面也牽動反思本國建築及科學之未來發展；至於滿洲國之所以支持熱河遺址的考察，既有滿足日本軍事控制與學術探險的意圖，更能進而追溯自身政權繼承清朝的淵源和確立合法訴求。

任何知識生產過程不能忘記媒介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日滿文化協會最初係為「消化」侵略果實，故以「合作」關係而產生。該協會對古物挖掘及所有權問題，試圖尋求一個雙方得以承認及「解套」的辦法，扮演舉足輕重之地位。而這些古物帶來的知識生產功能，當然是為了提供殖民政權進行治理所需。無論藉由原人考古，還是東京城乃至高句麗遺址的挖掘，日本與滿洲國企盼打造一個屬於「東亞共榮」的歷史淵源；通過追索其過程，尋求立國的價值，還有兩國「合作」的正當性基礎。此外，本文也討論了兩位曾參與調查活動的中國學者，從有限資料裡瞭解他們合作心態，包括後來的轉向。可以看到，儘管歷經不同政權，兩人共同否定了原來日本殖民的知識活動，但不約而同地訴諸東北地方意識之重要，或許才是他們真正加入滿洲國調查古物工作的因素。這些媒介顯示殖民力量再造地方知識之際，知識並沒有因為殖民事業的結束而中斷，進一步轉化為戰後培養地方意識及動力的來源。

相反地，站在民族主義的觀點，日本與滿洲傀儡政權的「合作」事業，猶如對華進行「文化侵略」，¹⁴⁵自然引來抨擊。從「思想戰」的角度衡量，國府與滿洲國雙方為了進行文化正統的解釋權，考古調查無異形同合法基礎的爭奪。若從更深層來看，如同西方殖民時的「文明化」一樣，我們應體察其中對後世的影響，未必全然帶來侵略之惡果。就在日本及滿洲國進行調查之際，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飽受極大刺激，紛紛投入類似工作，¹⁴⁶開始有系統地留意

¹⁴⁵ 〈文化侵略之日滿文化協會〉，《黑白》，卷1期2（1933年11月），頁31-32。

¹⁴⁶ 像是具有留日背景的常任俠，讀到與謝野寬、與謝野晶子合著《滿蒙游記》，感受最為深刻，說「其中所記人物，如旅館主人會社職員等，大率負有對華侵略任務，其處心積慮，可謂無微不至」。又提到矢野仁一研究蒙滿地理，「實亦侵略工具」，鳥居龍藏的考古活動，「雖一純粹學者，亦往往受帝國主義者之利用也」。見常任俠著，郭淑芬整理，沈寧編注，《常任俠日

日人長期對中國研究的成績。1935年1月，翁文灝（1889-1971）發表〈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的科學工作〉一文，開頭說：「專門學者對於各地的自然或人文現象，皆有研究的義務，尤其是對於他們國家所新得到的——不論是直接到間接——土地，他們更先爭調查，貢獻他們的知識」。這篇針對滿蒙調查團報告書的介紹，翁氏沒有明顯地民族情感論調，只是講出調查結果，又言「工作一年之後，便能有此許多東西印刷出來，足見他們的努力工作，足令空口宣傳的學者們見了慚愧！」¹⁴⁷同時則有馮家昇（1904-1970）撰文，強調：日人致力於東北進行考古學與人類學成果，研究上別開新路，更勝文獻研究；不僅「地下發掘之貢獻恐不亞於俄人」外，日滿文化協會更開啓「文化統治」的先聲。¹⁴⁸

滿洲國「以法爲名」，規範古物調查與保存活動，儘管有其「文化掠奪」之目的，但這並非毫無意義與價值。或許令人感到相當諷刺是，這些活動若干程度上確實還減低了文物的損失。1934年1月國博館的設置，最能凸顯其中意涵。這個仿效日本「爲了預防寶物散逸而設計」的機構，¹⁴⁹係由日滿文化協會籌建，本以「侵略」之目的而成立，結果卻扮演堅守與傳承文化的任務。1935年12月，羅振玉與杉村勇造商議將「滿洲原人」頭骨捐入國博館，後經東亞考古會幹事小林胖生斡旋，由日人攜回東京研究。之後，羅振玉、黑田源次（1886-1957）等力倡古物不可外流，故又於1938年送回。¹⁵⁰整件事的始末無疑說明國博館成爲關鍵點。至於羅振玉晚年收藏的明清內閣大庫舊檔，先是由日本外務省出資協助整理，嗣因國博館的保存也終免戰禍。直到

記集——戰雲紀事·上（1937-1939）》，頁107，1937年9月9日條。至於相關的古物保存事業，詳參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218-220；史勇，《中國近代文物事業簡史》，頁160-196。

¹⁴⁷ 引文俱見翁文灝，〈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的科學工作〉，《獨立評論》，期136（1935年1月），頁2。個別標點偶有更易。

¹⁴⁸ 馮家昇，〈東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績〉，《禹貢半月刊》，卷2期10（1935年1月），頁6-7。

¹⁴⁹ 藤本實也，《滿支印象記》（東京：七丈書院，1943），頁259-262。

¹⁵⁰ 佟柱臣，〈東北舊石器時代問題〉，《國立瀋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彙刊》，期1，頁166。

1948 年，這些舊檔因國共內戰發生，改以運送至北京以避兵災。¹⁵¹我們自然不能據此掩飾戰爭侵略所該承擔的責任；不過，當吾人重新認識滿洲國的古物調查工作時，體認「歷史陰影」下的遺產，似乎有其必要。在此思及戰後佟柱臣（1920-2011）一段話，不妨引為本文結語：

光復後痛感淪陷區文物機關的接收好壞，能左右國家的前途，……不但要接收文化機關的設備，更應該接受他們研究試驗的成績。如何去接收呢？接收作什麼用呢？徹底清楚他們研究達到某種水準，便是接收的準備；繼續既往水準向前研究，便是接收的用途。¹⁵²

¹⁵¹ 羅福頤，〈清內閣大庫明清舊檔之歷史及其整理〉，《嶺南學報》，卷 9 期 1（1948 年 12 月），頁 158-161。

¹⁵² 佟柱臣，〈東北舊石器時代問題〉，《國立瀋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彙刊》，期 1，頁 164。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文化侵略之日滿文化協會〉，《黑白》，卷1期2，1933年2月，頁31-32。
- 〈古物保存法及施行細則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01-012111-0004。
- 〈各省紀事·熱河省公署佈告第10號〉，《文教月報》，號1，1935年8月，頁67。
- 〈金毓黻致函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檔號元235-28。
- 〈指令·文教部指令第151號〉，《文教月報》，號1，1935年8月，頁42。
- 〈指令·文教部指令第206號〉，《文教月報》，號2，1935年9月，頁10。
- 〈指令·文教部指令第281號〉，《文教月報》，號3，1935年10月，頁29。
- 〈彙報·赤峰紅山地方古蹟發掘調查概要(二)〉，《文教月報》，號3，1935年9月，頁56-57。
- 〈熱河建築重修計畫(伊東忠太)昭和九年七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錄》，檔號B05015881800，「東方文化事業門講演視察及助成類：研究助成關係雜件第7卷」，<http://www.jacar.go.jp/>。(2012年9月1日檢索)
- 《申報》，1943。
- 《益世報》，1947。
- 《盛京時報》，1933、1939、1942。
- 《新京日日新報》，1933。
- 丸山泰通、田中隆子編，《衛藤利夫》，東京：日本圖書館協會，1980。
-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 五十嵐牧太，《熱河古蹟と西藏藝術》，東京：洪洋社，1942。
- 文 儒，〈編後〉，《歷史與考古》，期1，1946年10月，頁117。
- 水野梅曉，《滿洲文化を語る》，東京：支那時報社，1935。
- 水野清一，《東亜考古学の發達》，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会社，1948。
-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
- 末永雅雄，《日本考古学への道：一学徒が越えた》，東京：雄山閣，1986。
- 民生部厚生司教化科編，《滿洲古述古物名勝天然紀念物彙編》，新京：編者印行，1941。
- 伊東忠太，〈熱河の遺蹟〉，《建築雜誌》，輯51號625，1937年4月，總頁491-506。
- 伊東祐信，《熱河古蹟：避暑山莊と外八廟の調査と保存》，東京：伊東知恵子刊行，1994。
- 佟柱臣，〈東北舊石器時代問題〉，《國立瀋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彙刊》，期1，1947年10月，頁164-192。
- 杉村棟編，《八十路——杉村勇造遺稿集》，東京：編者印行，1980。
- 李文信，〈日寇在東北文化侵略的罪行〉，《文物參考資料》，卷2期9，1951年10月，頁202-209。

- 李文信，〈吉林市附近之史蹟及遺物〉，《歷史與考古》，期1，1946年10月，頁22-31。
- 李文信，〈葉柏壽行紀〉，《國立中央博物館時報》，號9，1941年1月，頁32-39。
- 李文信，《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訂本）》，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
- 赤堀英三，〈北滿ジャライノール遺跡出土の新資料〉，《人類學雜誌》，卷54號3，1939年3月，頁95-100。
- 里見甫編，《滿洲國現勢（建國——大同二年度版）》，新京：滿洲國通信社，1933。
- 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史學年報》，卷2期1，1934年9月，頁155-172。
- 和田清，《東洋史論叢》，東京：生活社，1942。
- 東亜考古学会編，《東京城：渤海国上京龍泉府址の発掘調査》，東京：編者印行，1939。
- 社團法人國際善隣協會編，《滿洲建國の夢と現実》，東京：編者印行，1975。
- 金 梁，《光宣小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 金毓黻，〈中大歷史學會試掘史蹟紀事〉，《說文月刊》，卷3期4，1941年10月，頁58-59。
-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瀋陽：遼瀋書社，1993。
- 春山行夫，《滿洲風物誌》，東京：生活社，1940。
- 夏 鼐，《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神田喜一郎、內藤乾吉編，《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96-1997。
- 翁文灝，〈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的科學工作〉，《獨立評論》，期136，1935年1月，頁2-4。
- 國務院文教科編，《第三次滿洲帝國文教年鑑》，新京：編者印行，1937。
- 國務院文教科編，《滿洲國文教年鑑》，新京：編者印行，1934。
- 國務院文教科編，滿洲國教育史研究會監修，《滿洲帝國文教科第二次年鑑》，新京：編者印行，1936。
- 常任俠著，郭淑芬整理，沈寧編注，《常任俠日記集——戰雲紀事·上（1937-1939）》，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2。
- 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編，《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報告·第一部總說》，東京：編者印行，1934。
- 陳 經，《日本勢力下二十年來的滿蒙》，上海：華通書局，1931。
- 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修會編，《朝鮮史編修會事業概要》，京城府：編者印行，1938。
- 渡邊豐日子，〈朝鮮の寶物古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に就て〉，《朝鮮》，號234，1934年11月，頁1-7。
-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1。
-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總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
- 馮家昇，〈東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績〉，《禹貢半月刊》，卷2期10，1935年1月，頁2-8。
- 遠藤隆次，《原人發掘——一古生物學者の滿州25年》，東京：春秋社，1965。
- 德永重康、直良信夫，〈哈爾濱の哺乳類化石の總括〉，《地質學雜誌》，卷44號525，1937年

- 6月，頁535-536。
- 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9，冊86。
- 閻琴，〈由三國國交成立想到中日滿文化的源流〉，《三六九畫報》，卷12期10，1941年10月，頁3-5。
- 橋川時雄，《滿洲文學興廢攷》，北平：文字同盟社，1932。
- 鴛淵一，《滿洲碑記考》，東京：目黑書店，1943。
- 龍冠海，〈書報述要·滿蒙全書〉，《清華週刊》，卷30期4，1928年10月，頁46。
- 濱田耕作，濱田耕作著作集刊行委員會編，《濱田耕作著作集》，卷7青陵隨想，京都：同朋舍，1993。
- 羅福頤，〈清內閣大庫明清舊檔之歷史及其整理〉，《嶺南學報》，卷9期1，1948年12月，頁125-166。
- 羅繼祖撰，蕭文立編校，《永豐鄉人行年錄》，收入羅振玉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附冊，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 藤木九三，《熱河探檢記》，東京：東京朝日新聞發行所，1934。
- 藤本實也，《滿支印象記》，東京：七丈書院，1943。
- 藤田亮策，〈朝鮮に於ける古蹟の調査及び保存の沿革〉，《朝鮮》，號199，1931年12月，頁86-112。
- 關野貞，《支那の建築と藝術》，東京：岩波書店，1938。
- 關野貞、竹島卓一，《熱河》，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4-1937。
- 顧頡剛，《寶樹園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11。
- Boerschmann, Ernest. *Chinesische Architektur*. Berlin: E. Wasmuth, a.g., 1925.
- Hedin, Sven Anders. *Jehol: City of Emperor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1932.
- Staunton, Sir George.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W. Bulmer and Co. for G. Nicol, 1797.

二、專書

- 小林英夫，《滿鐵調査部の軌跡，1907-1945》，東京：藤原書店，2006。
-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6，增補3版。
- 山根幸夫，《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教育文化交流》，東京：汲古書院，2005。
- 中村義等編，《近代日中關係史人名辭典》，東京：東京堂，2010。
- 中見立夫，《「滿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2013。
- 文化財保存全國協議會編，《新版遺跡保存の事典》，東京：平凡社，2006。
- 太田秀春，《近代の古蹟空間と日朝關係：倭城・顯彰・地域社会》，大阪：清文堂，2008。
-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1906-191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78。
- 白幡洋三郎，《旅行ノススメ：昭和が生んだ庶民の「新文化」》，東京：中央公論社，1996。

- 史 勇，《中國近代文物事業簡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
- 吉田裕，《現代歴史学と戦争責任》，東京：青木書店，1997。
- 村上美代治，《滿鉄図書館史》，滋賀：作者印行，2010。
- 冷繡錦，《「滿鐵」圖書館研究》，大連：遼寧人民出版社，2011。
- 坂野徹，《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一八八四——一九五二年》，東京：勁草書房，2005。
- 岡村敬二，《日滿文化協会の歴史——草創期を中心に》，京都：作者印行，2006。
- 岡村敬二，《遺された蔵書——滿鉄図書館・海外日本図書館の歴史》，東京：阿咩社，1994。
- 東北淪陥十四年史總編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會編，《偽滿洲國的真相——中日學者共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東北亜歴史財団編，赤羽目匡由等譯，濱田耕策監譯，《渤海の歴史と文化》，東京：明石書店，2009。
- 阿部洋，《「対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東京：汲古書院，2004。
- 栗田尚彌，《上海東亜同文書院——日中を架けんとした男たち——》，東京：新人物來往社，1993。
- 荒井信一，《コロニアリズムと文化財——近代日本と朝鮮から考える》，東京：岩波書店，2012。
-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 森本和男，《文化財の社会史——近現代史と伝統文化の変遷》，東京：彩流社，2010。
- 貴志俊彦、松重充浩、松村史紀編，《二〇世紀滿洲歴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
-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 鈴木仁麗，《滿洲国と内モンゴロ——滿蒙政策から興安省統治へ》，東京：明石書店，2012。
-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 Moder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 Ishikida, Miki Y. *Toward Peace: War Responsibility, Postwar Compensation, and Peace Movements and Education in Japan*. New York: iUniverse, 2005.
- Matsusaka, Yoshihisa. Tak.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 Mehta, Uday Singh.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Millward, James A.,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o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 Tanaka, Stefan.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Teow, S. H., *Japan's Cultural Policy toward China, 1918-1931: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三、論文

ピーター・ドウス著，藤原歸一譯，〈植民地なき帝国主義——『大東亜共栄圏』の構想——〉，
《思想》，號 814，1992 年 4 月，頁 105-121。

大出尚子，〈「満洲国」国立博物館の展示における「満洲色」の創出——高句麗・渤海・遼の古
蹟調査を背景として——〉，《内陸アツア史研究》，號 25，2010 年 3 月，頁 121-142。

大出尚子，〈日本の旧植民地における歴史・考古学系博物館の持つ政治性——朝鮮総督府博物館
及び「満洲国」国立（中央）博物館を事例として——〉，《東洋文化研究》，號 14，2012
年 3 月，頁 1-28。

山室信一著，陳姪媛譯，鍾淑敏校正，〈國民帝國日本的異法域統合與差別〉，《臺灣史研究》，
卷 16 期 2，2009 年 6 月，頁 1-22。

中見立夫，〈「元朝秘史」渡来のころ——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学」の開始とヨーロッパ東洋学、
清朝「辺疆史地学」との交差——〉，《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 4，2009 年 3 月，頁
3-26。

中見立夫，〈日本的「東洋学」の形成と構図〉，收入岸本美緒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
学知：第 3 卷・東洋学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13-54。

平山勉，〈満鉄の調査と研究：その「神話」と実像〉，收入松村高夫、柳澤遊、江田憲治編，《満
鉄の調査と研究》，東京：青木書店，2008，頁 25-120。

田中禎彦，〈満洲国における熱河古蹟の調査保存事業——日本植民地における歴史建造物の調査
保存と異文化理解——〉，《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號 569，2003 年 7 月，頁 201-208。

吉澤誠一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諸相〉，收入松浦正孝編，《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
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頁 294-314。

寺内威太郎，〈「満鮮史」研究と稻葉岩吉〉，收入寺内威太郎、永田雄三、矢島國雄、李成市等
編，《植民地主義と歴史学》，東京：刀水書房，2004，頁 19-70。

西澤泰彦，〈「満洲国」の建設事業〉，收入山本有造編，《「満洲国」の研究》，東京：綠蔭書
房，1995，頁 377-460。

佐々木亨，〈満洲国時代における観光資源・展示対象としてのオロチョン〉，收入煎本孝編，《東
北アジア諸民族の文化動態》，札幌：北海道大学図書刊行会，2002，頁 163-213。

佟悦，〈金梁與初期的瀋陽故宮博物館〉，《中國博物館》，1989 年第 4 期，頁 15-20。

佘俊巖，〈達海墓考證〉，《北方文物》，2006 年第 4 期，頁 52-54。

李娜，〈滿鐵對文化名城及古建築的「踏査」〉，《東北史地》，2010 年第 1 期，頁 88-92。

- 松村潤，〈白鳥庫吉〉，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頁 37-47。
- 酒寄雅志，〈東亜考古学会の東京城調査〉，收入菊池俊彦編，《北東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10，頁 191-211。
- 清水美紀，〈1930 年代の「東北」地域概念の形成——日中歴史学者の論争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植民地研究》，號 15，2003 年 6 月，頁 37-53。
- 許明綱，〈日本人の大連における考古活動（1895-1945 年）〉，《古代文化》，卷 45 號 10，1993 年 10 月，頁 47-53。
-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2，2003 年 12 月，頁 1-45。
- 陶德民，〈鄭孝胥與水野梅曉的交往及其思想初探——以霞山文庫所藏《使日雜詩》卷軸爲線索——〉，《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號 26，2005 年 3 月，頁 35-54。
- 葉碧苓，〈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史學界對日本「滿蒙論」之駁斥——以《東北史綱》第一卷爲中心之探討〉，《國史館學術集刊》，期 11，2007 年 3 月，頁 105-142。
- 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關於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171-197。
- 槇林啓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考古・民俗資料の収集〉，收入芹澤知広、志賀市子編，《日本人の中国民具収集：歴史的背景と今日的意義》，東京：風響社，2008，頁 169-193。
- DuBois, Thomas David. "Local Religion and the Imperial Imaginary: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Ethnography in Occupied Manchuri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1 (February 2006), pp. 52-74.
- Duus, Peter. "Japan's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An Overview." In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xi-xxix.
- Iriye, Akira. "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 The Hsin-min Hui."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54-274.
- Leibold, James. "Competing Narratives of Racial U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From the Yellow Emperor to Peking Man." *Modern China*, 32:2 (April 2006), pp. 181-220.
- Nakao, Katsumi. "Japanese Colonial Policy and Anthropology in Manchuria." In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s.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 Surrey: Curzon Press, 1999, pp. 245-265.
- Osterhammel, Jürgen. "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oward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In Wolfgang J.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 eds.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 pp. 290-314.

Tamanoi, Mariko Asano. "Knowledge, Power, and Racial Classification: The Japanese in Manchur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2 (May 2000), pp. 248-276.

Wong, Aida Y. "Dunhuangology as Nationalist Apparatus: The Kyoto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and its Connections with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Roy Starrs, ed. *Jap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At Home and in the Asia Pacific*. Folkestone, Kent: Global Oriental, 2004, pp. 252-267.

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lonial Knowledge: Antiquities Surveys and Activities in the Manchukuo Period

Lin Chih-hung*

Abstract

How did various cultural activities sponsored in Manchukuo help the Japanese colonial regime work, and how did they continue even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aking the case of antiquities survey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ole of Manchukuo in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highligh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ism and knowledge. Given the rising awarenes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cross East Asia the 1930s, Manchukuo promulgated laws relating to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and began a “cooperative” project with Japan to conduct academic surveys. Although surveys had thei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urposes, they also corresponded with the needs of Manchukuo and Japan. The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Japan and Manchukuo was a semi-official organization that carried surveys and also helped resolve the ownership of antiquities. Japan could also search for Chinese economic 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even eliminate anti-Japanese forces. In addition, Manchukuo established its origins in the Qing Dynasty, strengthening its legitimacy as heir to the Q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antiquities was designed to create an “East Asia Co-Prosperty” tradition and attract Chinese collaborat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n” academic research and knowledge.

Keywords: Manchukuo, antiquities surveys, colonial imperialism,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Japan and Manchukuo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